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
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

红色中国网文集

(2020 年)

目录

和右派朋友谈谈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命运	2
自由主义追求的是什么	5
“克里奥斯”网友是自由主义者吗?	8
属于我们的时刻是现在而不是未来	11
再复克里奥斯 —— 我曾经也是自由派	15
美国很强大，中国决不挑战 —— 唯有珍惜改革开放.....	17
本人躬逢其盛的几次左派浪潮.....	20
武汉疫情亲历记 —— 对于吹哨人假设的推演和复盘	22
黑人的命贱还是警察的命贱?	31
聊聊美国的阶级斗争和两党政治	37
特朗普时代和美国的阶级斗争	42
有了“双航母”，中国海军就可以无敌太平洋?	47
美国大选发生严重舞弊，美国面临空前政治危机	52
民主党在威斯康星州选举舞弊的铁证	55
特朗普，“弱智老白肥丑男”们的英雄	57
晚期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世界阶级斗争	68

和右派朋友谈谈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命运 (2020年1月9日)

红色多瑙河

最近看了石人一只眼朋友（本文中简称石人）的两篇文章，其中回复红色中国网诸位网友的那一篇里这样写道：

“因此，从更实际的角度出发，我们不妨先参考一下世界上先进国家的经验，在未来的社会至少能做到尊重和保护所有社会群体的权益，而不是像毛泽东那样着急地「消灭」一些「剥削阶级」，然后自己又变成了新的「剥削阶级」。我相信，只有一个尊重所有社会群体权益的政权，只有权力受到充分「监督」和「制衡」的制度，才能不让「文革」这样的悲剧重演。”

如果我的认识没有重大偏离的话，这段话算是真诚的自由派的政治理想的集中表达。其中石人朋友提到的通过“监督”和“制衡”来“尊重”和“保护所有社会群体的利益”，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政治理念。我们知道从霍布斯和洛克开始，古典自由主义一直秉承着这样的理念，即个人人是理性的、自持的，自利的，并且拥有“生命、自由、财产”等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而处在“自然状态”下，由于没有公允的和有强制力的制裁机关，逐利的个人之间势必发生冲突，并无力阻止冲突升级，最终导致“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为维护天赋人权，个人通过契约结成社会，而社会又将仲裁冲突的权利通过宪法转让给国家。古典自由主义中的个人面对着两个敌人，一个是其他个人，这需要国家仲裁；另一个是国家本身，这需要个人诉诸法律程序（通过制衡机构）或诉诸天赋人权（通过推翻政府）来维护个人利益。

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是消极自由，即自身行为免于收到干预的自由。在今天的背景下，自由主义者主要强调的是免于收到国家侵犯的自由，即政治上的公民权利，经济上的自由市场和文化上的多元主义。这也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部分小资产阶级中最有号召力的部分，这也反映在了石人网友第一篇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析中。

自由主义最初是以反对封建地主和重商主义国家的面貌出现的，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革命中，自由主义不仅团结了传统小业主，也团结了部分无产者。所以，在反封建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当时还很弱小）是同盟关系，而地主阶级的保守主义是两者共同的敌人。

与自由主义不同，保守主义中的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世界是不可知的，人是天生腐化堕落的，因此需要社会传统和习俗，尤其是长幼尊卑的秩序来维持基本稳定。而传统本身这是历代积累的智慧和经验，不可能被简单地被某些（自由主义者认为的）基本的“理性”原则和“天赋人权”所否定。因此就算社会变革是历史的必然，那也只能通过缓慢的改革来实现。

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中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一方面在经济上对地主阶级形成优势和吸引力，大量的地主（如英国贵族和德国容克）自己成为了资本家；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殖民主义的殖民主义的海外剥削成功造就了一批“工人贵族”，削弱了这些国家的革命潜力。这样，地主的保守主义和工人的社会主义同时向自由主义靠拢，自由主义成为了统治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历史巅峰出现在二战之后的经济繁荣时期，此时，自由主义为了满足工人群众日益提高的政治经济需要，其核心理念已经从“消极自由（不受束缚的自由市场）”逐渐转向了“积极自由（保障公平的福利国家）”。在那个时候，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退化了的社会主义者（社民党）的利益在经济繁荣和帝国主义全球剥削秩序稳定的情况下的同时实现。这就是石人网友说的“所有社会群体”的利益得到保障的客观条件。

这个客观条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就已经不存在了，发达国家工人斗争造成的利润挤压侵蚀了资本家的利益，资本家通过国际产业转移成功地打击了本国工人。发达国家工人实际工资长期停滞，原有的自由主义和劳动人民的妥协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想要甩脱福利国家的包袱，社会公平的目标被放弃，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又从积极自由倒退回消极自由，这就是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但这时的自由主义已经不再是领导人类进步的旗帜，它已经不在和保守主义进行斗争，相反，它和保守主义结成了同盟，并发起了对劳动人民的战争。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基本上成为了同义词。新保守主义者需要自由市场规训劳动者，压制工资，维持劳动纪律；

新自由主义者需要“家庭传统”、“企业文化”、“爱国主义”，直到军警镇压和武装侵略来保证国内外市场秩序。

昔日的敌手成为了盟友，这不是自由主义者精神错乱或者某些临时的策略。正如十九世纪保守主义所面对的窘境一样，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进步性在今天已经消耗干净，它和保守主义一样成为了无法“尊重”和“保护”一般劳动人民利益的，落后于现时代历史包袱。

资产阶级发起的新自由主义运动横行天下已经有四十年了，除了在一些从全球化中直接获利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金融和高科技行业）中“深入人心”之外，它在世界上的其他所有地方都遭到了失败。在近十年间，所有以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为基本理念的政治运动都在迅速退潮，整个世界越来越走向为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帝国主义和受压迫民族的尖锐对立。今天的自由主义已经不再去保证人民群众受教育、有工作、能养老的基本权利；相反，除了摆几个少数族裔和性少数的花瓶外，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了对人民群众经历的一切社会灾难的讽刺和诅咒。

正如我前面所讲的，从全球化中获利的部分小资产阶级是今日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在阶级斗争风起云涌、世界资本积累秩序摇摇欲坠的今天，这种小资产阶级队伍的扩张已经达到极限。由于他们主张国企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全盘去管制，他们与本国一般劳动群众的利益是敌对的。切断了与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今天自由主义已经失去了造血能力，它的历史命运也随之确定：自由主义的腐烂和死亡，将是不远将来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曲。

回复“红色多瑙河”——自由主义追求的是什么

(2020年1月9日)

克里奥斯

看到这篇文章开头对古典自由派理念的复述时，我原本期望能够这样完整叙述我的理念的作者能够给予一些值得认同和讨论的，存在于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或实践中的问题。很不幸地，接下来的内容证明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并不打算去理解我们。他依然选择了将社会主义者乃至泛左派挂在嘴边的阶级斗争以及社会进步作为问题的核心，进而整段文章也只不过是进步主义对自由主义的那一套传统的批判。这些批判的论据在一百年前没能驳倒或击败自由主义，在今天也同样不会。

令我最为失望的是，这篇文章自称在谈自由主义的“历史命运”，想要“与右派朋友们探讨”，但是从文章内容可以看出作者所审视的并非自由主义本身，而是“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发展的作用”。举个例子来说，文章的其中一段说道

“自由主义最初是以反对封建地主和重商主义国家的面貌出现的，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革命中，自由主义不仅团结了传统小业主，也团结了部分无产者。所以，在反封建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当时还很弱小）是同盟关系，而地主阶级的保守主义是两者共同的敌人。”

“反对封建地主和重商主义国家”、“不仅团结了传统小业主，也团结了部分无产者”，换句话说，在作者看来，最初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好，是因为它在那时的理念和社会主义者的理念吻合。而后来之所以自由主义会“腐烂死亡”，也是因为它“已经不再是领导人类进步的旗帜”、“发起了对劳动人民的战争”，换句话说，自由主义追求的目标在此时和社会主义以及进步主义不再相同，所以它从有益变成了有害。但是，问左派对自由主义的看法，与自由主义者有何相关呢？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者不在意底层工人利益或者（一部分）社会进步，但是若是所有的问题从一开始就被用左派的标准衡量，再讨论自由主义的意义又有什么意义呢？自由主义本身就有它自己的一套标准去衡量进步与平等，而对这套标准的冲突才是古典自由派和进步派最核心的冲突。这篇文章却对这重要的问题闭口不谈，而是直接跳到了已经把自己的标准作为客观事实去衡量一切步骤，那么文章想要表达的大部分信息也就很难被并不接受这些标准的自由派接受了。

而这些在文章中被以客观事实的口吻描述的理念则是真正值得争辩的，其中最重要不过“平等”和“进步”了，两个概念之间也息息相关，在左派，尤其是受马克思影响的左派看来，社会的最大问题是资源分配不平等以及上层阶级少数人对下层多数的剥削与压迫，而几乎所有的社会矛盾、战争和悲剧都可

以归结于这种阶级冲突，因为这种冲突不可化解，所以无产阶级终将战胜资产阶级，而社会将会逐步从一个发展阶段走向下一个必然的阶段，最终实现理想的乌托邦，而所有阻止这种进步的力量都是必须被打倒、扫除的障碍。在 21 世纪，见证了红色革命造就出的苏联以及衍生证券的极权保证后，许多左派都承认苏联的道路是这场伟大进步运动的一条死路或者弯路，但依然坚持历史的进步和终结是必然。如果反对者以苏联作为例子证明共产主义的不可行性，左派就会拿出大萧条、经济危机、贫富差异等问题作为自由市场缺陷的证据。

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和守护者们拿出过合理的论据去反驳这种宣称，但这些论据很不幸地不属于我所了解的知识范围。另一方面，这篇文章用了“自由主义在世界上的其他所有地方都遭到了失败。在近十年间，所有以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为基本理念的政治运动都在迅速退潮”这样的描述，但也没有给出相应的可靠事例。考虑到总会有人去讨论那些事例，我更希望探讨我所最关注的，自由主义以及进步主义的理念本身。

归根到底，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核心追求还是只有一个：自由，而我们反对的东西也只有一个：过大的政府权力。我们相信，每位个人拥有天赋的掌控自己生命、自由、财产的权力；我们相信每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探寻在他自己看来最好的道德伦理、生活、抉择，哪怕他的选择可能是对自己有害的；我们相信一个社会成千上万的成员在独自以及合作去探索、抉择时，他们能做出远比一群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精英要明智地多的决定；我们相信我们的自由并不应该要求他人的积极行动，因为那意味着对他人自由的剥夺；我们也相信如果我们被剥夺了这种权力，如果过度膨胀的政府掌控了我们的生活，这本身便是最大之恶，而得到这种过大权力的政府最终也会被这种权力所腐化。就像自由主义的名字所明示的，对于我们来说，自由并非为了平等、进步或是任何目的，自由本身便是我们最大的目的和荣耀。

因此虽然自由主义者可以拿出各种反驳政府调控、反对社会福利的论据，他们支持他们的政策的根本原因并不只在于这些政策的可行性，而是在于道德性。自由主义者的追求是保护人权自由，而不只是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自由主义者对社会的贫困者、工人以及真正的被压迫者持有与社会主义者相同的怜悯和同情，但我们并不相信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方案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认为那些大规模扩大政府权力的方案不止会摧毁经济，更会让每个人失去自由和权力，而至今仍然存在的红色政权则是我们的担忧的最大证据。

古典自由主义的奠基人都是基督徒。后来的自由主义者并不一定要信仰宗教，但必须要相信人超越其物质存在的尊严和权力。只有当你相信一个人生而为人本身就是尊贵的，而不需要依靠任何物质的满足，以及他所享受到的所有奢侈都并非他天生应得的时，你才能去接受自由主义的种种其它理念。这样的一种信仰，在我看来，是限于时间以及地点的，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的人都有权承认自己的权力，并为了自己的权力而斗争。这种理念和其它思想的理念可能会有重合和冲突，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它永远不会过时，而自由主义者也永远不会在这方面让步，无论是为了所谓的“平等”还是“进步”。

因此，如果想要宣称“自由主义会腐烂死亡”，那么作者就必须澄清自己在说的是什么，如果他认为有一天人将不会、不应该再守护自己的权力以及自由，那么我认为他的宣称从事实上和道德上都没有在争辩的必要了。如果他所试图否认的是自由市场政策在未来的可行性，那么我们所需要关注的就是长期以来，公民的社会自由和政治权力是否还像过去一样和经济自由有紧密的关联。在这方面，我认为我始终是乐观的。

“克里奥斯”网友是自由主义者吗？

（2020年1月10日）

红色多瑙河

很高兴这位网名“克里奥斯”的网友（以下简称克兄）这么快给我回复。克兄自称是自由主义者，对我文章的诸多内容提出了很有意思的创见，我非常欢迎。不过从克兄的文章中，我对克兄自称的自由主义者身份却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首先，克兄对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的认知是不准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克兄自己认为，古典自由主义反对的东西只有一个，即“过大的政府权力”，这就反映了克兄对古典自由主义基本理论并不熟悉。古典自由主义的第一个集大成者洛克就认为，为了防止自利的个人陷入恣意杀伐掳掠的“自然状态”，就必须对个人自由有所限制，其限制的方式就是将仲裁纠纷的权力通过社会契约交付给社会，再由社会通过宪法交付国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的第一个追求，就是关于如何利用国家权力，限制过大的个人自由，以追求社会稳定。如果古典自由主义只有自由一个“核心追求”的话，那自然不需要宪政，也不需要国家，需要的只是个人“独自以及合作去探索抉择”。如果这能成功的话，这自然可以摆脱资本主义社会常见的“颐指气使的精英”，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目标”和“荣耀”。但这并非自由主义者政治理想，由于忽略了古典自由主义的逻辑前提，克兄走向了无政府主义，即认为不受干预的自发的个人合作就可以实现社会的有序运行，从而背叛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

第二，克兄认为左派的理解**因为是左派搞出来的所以“与自由主义者无关”**，因而不需要被讨论。这体现了克兄对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即个人理性的误解。自由主义者认为，人类理性可以认识世界，可以相互交流，可以进行辩论并得出某项认识是否符合事实，从而可以缔结并服从契约，构成社会和国家。而克兄认为，自由主义者的理念是不能用“左派的标准”去衡量的，所以左派不能通过与自由主义者交流辩论来达到对自由的认识。这样就会产生两种可能，要么克兄认为人类理性的残缺的，是不能相互理解从而也不能认识世界的。那这唯一的结果就是抱团取暖，以传统价值为核心建立社会，如果属实，克兄实际上所持的政治理念是保守主义；要么克兄认为所有非自由主义者的理性都是残缺的，因此与他们讨论自由主义“没有意义”。那么，在克兄看来包括左派在内的非自由主义者都是脑子不正常的次等人类，克兄的这种认识直接把他带到了法西斯主义。由于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分析单位理性个人缺乏认识，克兄

要么把全体人类，要么把部分人类排除出理性之外。由于拒斥了自由主义的核心假设，克兄的理想社会必然与自由主义的构想大相径庭。

第三，克兄在表达了对自由主义的看法和对左派的鄙视之后，没有去讲历史，也没有去讲理性，就开始对自由主义者道德高尚的“尊贵”人生自我感动了起来。但是他的自我感动，尤其是在关于某些个人的奢侈享受是否“天生应得”的问题上，又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发生冲突。自由主义天赋人权的第三项“财产”，是包括继承所得在内的。按照克兄的说法，为了维持人的“生而尊贵”，就必须要让每个人相信有产者家庭的后代一生下来就继承的私有财产是“并非应得”的。他们与工农的后代一样，是不需要这些“物质的满足”的。在否定了私有财产继承关系的合理性之后，克兄又成了一个他自己都看不起的社会主义者。

克兄说我“并不打算去理解”他们，这是不对的。首先，克兄要自己澄清自己的政治理念究竟来源于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还是他自己宣称的自由主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克兄并没有体现出任何“理解”自己的能力，自然没有能力做出我们是否“打算理解”他们的判断。第二，坦率地说，克兄认为我“不理解”他们的原因，正是因为我们比他们自己还理解他们，正是因为我们马列毛主义者不仅看到了他们已经看到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或实践中的问题”，而且看到了他们看不到的自由主义的历史命运，而这正是我上一篇文章的基本内容。

克兄要我澄清我讲的自由主义是什么。我通篇都在讲作为当今统治阶级指导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即通过给予人民群众形式上的消极自由，从而巩固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巩固雇佣劳动和剥削关系，阻止人民实现积极自由的自由主义。而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讲的自由是积极自由。现代自由主义者在巅峰时刻曾经一度梦想过，但最终放弃了，这个旗帜由我们来继承。我们讲的积极自由，是通过剥夺资本家，国家组织生产、分配和消费，保障人民群众管理国家、接受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权利，从而实现全面发展的自由。即认识必然，实现必然的自由。我们不仅要消灭自由主义背后的统治阶级，我们还要重新定义自由为何物，这就是我要澄清观点，这也是我对你们的自由主义的历史命运的看法。

克兄不仅对自由主义自身有着颇多误解，对左派也是知之甚少。别的不说，红色中国网上百花齐放栏目就有一些左派认真反思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原因的文

章。尤其是关于权力的腐化的关系，红色中国网的编辑们有着比自由主义者更深刻的认识，如果克兄能克服自己对我等“理性残缺”之人的鄙视，来看看这些文章的话，我们可以有更深入的讨论。

克兄自然不会同意我的看法，他很自信地说，一百年前社会主义没击败自由主义，今天也不会。他历史视野太短了，如果一个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法国王族说《政府论》这东西一百年前没击败我们的神授君权，现在也不可能，那么今天的我们会如何评价呢？从《共产党宣言》开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才进行了不到两个世纪，这比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自由主义取代保守主义的时间可短得多。在上一个一百年没打败你，在下一个一百年我们有的是机会。前途似锦，来日方长，我们可不会像克兄那样，还没好好讨论就说什么“与自由主义者没有关系”，“没什么讨论的必要了”这样的丧气话。我们曾有过社会主义，我们也曾丢失过社会主义，我们吸取了失败的教训，我们正在一点点站起来。我们会在未来的社会运动中，一直战斗，一直争论，直到你们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再答红色多瑙河 —— 属于我们的时刻是现在而不是未来 (2020年1月10日)

克里奥斯

首先，对于才疏学浅的本人第一次被人点名反驳，我感到百感交集。在回复中，“红色多瑙河”认为我“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虽然这让我初步感到惊讶，但是总的来说，我并不在意几个名称的纠纷。我懂得不多，但也很清楚自己的立场，任何人都可以用任何称呼形容我，甚至称我是法西斯也没关系。我相信这些宣称总有自己的证据，我只在意名字背后的实际问题。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我的无知，我无论是在自己写的第一篇回复还是这一篇当中，都不打算回答左派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者是在他们看来我所相信的意识形态的所有质疑。我的这篇回复并不会一劳永逸地给出所有问题的答案。甚至，我可能不会写出我所了解的所有知识和论据。在这个时间和网站，最终被我发表的内容就是我所想表达的一切，这些内容并不能代表我或者我背后的思想的全部，但这点是众人皆知的，故也没有争论的必要。

红色多瑙河的这篇回复中许多对我的指控（如果可以这么形容的话），都正是把这一段短文的内容当作我思想的全部。在第二段中他就写到，

克兄自己认为，古典自由主义反对的东西只有一个，即“过大的政府权力”，这就反映了克兄对古典自由主义基本理论并不熟悉。

这可能要归功于我并没能用正确的词汇描述吧，但在原句中我是这么写的，

归根到底，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核心追求还是只有一个：自由，而我们反对的东西也只有一个：过大的政府权力。

这一句话以及接下来的一段都是我试图描述自由主义者，或者至少我自己相信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因。我试图指出无论从自由这一目的延伸出的理念、政策有哪些，最终真正驱动我们的还是我们对个人自由的追求以及对滥用政府权力的恐惧。

正如多瑙河的回复里说道，霍布斯、洛克以及受他们启发的自由主义者相信人在自然状态下固然是完全自由，但随后这种状态也必然会造成混乱以及互相杀伐，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需要政府。多瑙河认为这说明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也包括支持政府，这一宣称在字面上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至少在我看来，洛克的理论实际上在试图证明，如之后的独立宣言所说，“政府存在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自由，而如果本来为了保护自由和权利而建立的政府侵犯了自由，那么政府应当被推翻”。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个人自由与权利才是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对于政府，我完全认同洛克的理论，我反对在我看来过剩的政府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反对政府或者宪政。我从未写过我支持无政府，只是因为政府权力是在我看来自由主义和左派的最主要理念冲突之一我才如此着重于描述自由主义对政府权力的反感。

在接下来的一段，多瑙河又把我的观点总结为

“认为左派的理解因为是左派搞出来的所以与自由主义者无关，因而不需要被讨论。”

并以此延展出了接下来一整段的论点。但我同样没有说过左派的理解与自由主义者无关。我的原文是针对多瑙河文章本身的回应。在我看来，多瑙河在《和右派朋友谈谈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命运》中名义上是试图与自由主义者沟通，但是文章内容实际上是先默认了左派的价值观和历史观，然后以这一套观点和标准去审视自由主义，然后得出结论。这导致无论他的论证和逻辑有无错误，我与他以及我们所属的理念在一开始还没能认同一个统一的道德标准。如果我们的对手连自由的价值都不承认，我们该如何与他们争辩呢？这是我写第一篇回复想表达的主旨。

接下来一整段主要是说明自由主义者相信人类可以互相交流和辩论，而我（在他看来）却认为这种交流是没有意义或者不可能的。这是对我的误解，但可能只是一部分。在认同多瑙河所描述的，自由主义对人类理性交流辩论能力的前提下，我相信人的理解和认知是包括一部分非理性的、并非从逻辑得出的默认事实和标准的。这一部分知识包括常说的信仰和道德标准，它们是接下来所有政治哲学理论的基础，而那些理论只是基于这些基础的推理和延伸。这一点是被许多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认同的，就像我在第一篇回复中写到的，

古典自由主义的奠基人都是基督徒。后来的自由主义者并不一定要信仰宗教，但必须要相信人超越其物质存在的尊严和权力。

那么我是否认为因为我们所相信的道德基础不同，辩论就完全没有意义呢？我确实看得出一种往这一方向走的意识形态，但我并不认同。我发现在人类彼此相信不同的宗教、思想的前提下，我们是完全拥有理性讨论的能力的，包括辩论双方都能认同的事实、检验彼此言论的逻辑等交流都能让我们对世界和自身有更清楚、更正确的认识。但若我们想要进行这种有益的辩论，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确实是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和基础的。在多瑙河的第一篇文章中，他想要和自由主义者交流，却全文只口不提自由主义者的道德，我并不认为在这种条件下交流会可能的。就像如果我想要写一篇和左派交流的文章，我也同样要提到他们视为目的的社会公正和进步。我的回复并不是为了证明讨论没有必要，而是试图说明如果我们想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多瑙河就必须先承认自由作为目的本身的重要性。

第三，克兄在表达了对自由主义的看法和对左派的鄙视之后，没有去讲历史，也没有去讲理性，就开始对自由主义者道德高尚的“尊贵”人生自我感动了起来。但是他的自我感动，尤其是在关于某些个人的奢侈享受是否“天生应得”的问题上，又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发生冲突。自由主义天赋人权的第三项“财产”，是包括继承所得在内的。按照克兄的说法，为了维持人的“生而尊贵”，就必须要让每个人相信有产者家庭的后代一生下来就继承的私有财产是“并非应得”的。他们与工农的后代一样，是不需要这些“物质的满足”的。在否定了私有财产继承关系的合理性之后，克兄又成了一个他自己都看不起的社会主义者。

我并不记得我在哪里写到我对我对社会主义的鄙视过。事实上，哪怕我一直在批判社会主义实施

带来的种种后果，我一直相信他们是心怀好意的。至于我没有讲历史和理性的原因，我在原文中专门用了一整段去说明，在这里原封不动地贴上来，

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和守护者们拿出过合理的论据去反驳这种宣称，但这些论据很不幸地不属于我所了解的知识范围。另一方面，这篇文章用了“自由主义在世界上的其他所有地方都遭到了失败。在近十年间，所有以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为基本理念的政治运动都在迅速退潮”这样的描述，但也没有给出相应的可靠事例。考虑到总会有人去讨论那些事例，我更希望探讨我所最关注的，自由主义以及进步主义的理念本身。

如果多瑙河想要以此证明我的无知，我将不得不承认他是正确的。我将以我该有方式去增加自己的知识，而无论我的无知对他有什么益处，都正在此时被他享受着。但在那之前，我想先说明我描述私有财产“并非应得”是什么意思。我写的时候心想的是英语的“deserve”。我的意思是人并没有权在去要求自己必须得到多少数额的财产，这并不意味着生来继承财产的人应当交出他们的财产。继承的财产仍然是“合理”的，或者至少我的宣称暂时是如此，虽然这个问题本身复杂到需要专门做一篇文章，而我担心自己没有写那篇文章的学识。

至此，我发现这篇回复的主要内容似乎都成了对一些我并不持有的观点的反驳。让多瑙河犯这种错误的原因可能是我没能很好表达自己的立场，也可能是因为他太急于开始意识形态的对抗。但无论如何，既然这篇回复是对我立场的误解，那么我的回复也只能是对自己立场的澄清。多瑙河希望探讨历史和理性，对此我也少有理解，但很不幸地我从未对自己自信到能够做出诸如“自由主义的腐烂的死亡，将是不远将来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曲”这样需要对历史发展大局和细节都需要深刻了解才能支持的宣称。但我将始终尽自己所能，而多瑙河、认同他的其他左派以及其他自由派都有自己的观点和论据。在我看来，也许也是在他看来，这些理念的交流和辩论本身可能比其中任何一种理念的正确与否要重要得多。

但至少，多瑙河确实回复了我希望他解释自由主义的要求。简单地来说，他所支持的就是积极自由取代消极自由。首先当他提到这两个名词的时候就该注意到，现代自由派对积极消极自由的区分是启发自柏林爵士，这种区分的目的就是描述需要强制他人积极行动，也就是需要消耗他人自由的积极自由和不需要他人积极行动的消极自由的区别。甚至多瑙河自己也写到，实现积极自由需要“剥夺资本家，国家组织生产、分配和消费，保障人民群众管理国家、接受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权利”。而该理论最重要的结论就是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是相互冲突的，保障了积极自由就要损失消极自由。自由主义者当然打算放弃消极自由，但归根到底我们反对的理由是出于道德，因为我们不认为强制一部分的损失来换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是道德的。我们也不相信执行这个任务的政府能够控制好被赋予的巨大权力。我们可以就这几点辩论，但是关于积极自由的道德性，我们的许多冲突都将不只是逻辑推理过程的不同，而更多是价值观本身的冲突。

多瑙河的最后一段提到了几个很有趣但也并不新鲜的历史宣称。“如果一个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法国王族说《政府论》的东西一百年前没击败我们的神授君权，现在也不可能，那么今天的我们会如何评价呢？”至少我的评价是，这位王族可能也没有说错，因为在他说完这句话的数十年后，当他自己的脑袋可能都掉进竹篓的时候，取代波旁王朝的革命政权不幸落入了雅各宾派之手，随后展开了恐怖统治，在那之后不久法国则又恢复了君主制。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两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不认为我们摆脱了专制与极权。我甚至不觉得我们完全摆脱

了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而许多诞生自那些时代的思想可能到今天还被我们认同。多瑙河所代表的激进思想，在我看来，也是这种政府权力的无限制扩张的原因之一。

我不知道其他自由主义者的看法如何，但我相信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如同马克思宣称地那样单纯地线性前进的。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走向何方，但但凡我们了解过去与现在，我们可以慢慢地测试、选择、比较不同的政策、理念，不断地改良我们的政府和社会。这是我的“进步主义”，但是一方面如上一篇所讲，我相信在这种发展中对自由以及个人权利的追求是永恒不变的，另一方面，因为如此我也不会去宣称任何理念是必然会随着历史进步而被抛弃的。我认为仅仅是因为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诞生于过去并不意味着现在的我们需要将它们抛弃，我不知道进步主义者如何看待它们。在他们期盼的必然未来到来时这些思想是会被政府强制打压禁止，还是会被允许保留，并继续吸引支持者？

当然，在左派看来最好的结局可能就是在未来人们都意识到社会主义不可否认的优越性并主动放弃这些旧思想了。就像多瑙河拿出了比我还要坚定地自信说道“我们会在未来的社会运动中，一直战斗，一直争论，直到你们退出历史舞台为止”。未来的进步主义者是否会指着多瑙河，如同他指着过去的苏联一样，说他们走了一条弯路呢？我并不在乎。如果有一天，他的阵营实现了能够完美保证社会平等、繁荣、能让人享受积极自由的好处又不放弃消极自由的权利的完美乌托邦，真正做出选择的将不会是我们自由主义者，而是人类本身。与进步主义者不同，属于我们的时刻是现在而不是未来。在我们退出舞台的时刻到来之前，时代就会将我们淘汰，而在那之前，我们可以耐心地等待着，并像我们应当做地那样，尽我们所能地去保护我们所珍重的个人权利与自由。

再复克里奥斯 —— 我曾经也是自由派 (2020年1月11日)

红色多瑙河

感谢克兄的积极回复，我喜欢这样的讨论，并且愿意将这个讨论继续下去。所以当克兄又一次说“没有争论的必要”时，我确实稍感失望。不过，克兄在新的回复中又提到了一些问题，我打算进一步讨论。

首先，克兄认为我“只口不提自由主义者的道德”，因此不具备和他交流的“条件”。这显然是对我的误解。我在《历史命运》一文中明确且反复指出古典自由主义自由观和道德观的核心是“消极自由”，这个概念不是左派扣在自由主义者身上的屎盆子，而是自由主义者伯林自己对自由主义者的概述。因此，我是在用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理解，结合自由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去探讨自称自由主义者的克兄如何在短短几千字的文章中数次背离自由主义的。如果这都让克兄认为我们没有交流的条件，那就只有如下结果：克兄认为我无法与之交流的原因，不是我在文中表现了某种左派的偏见，而是因为我是个左派。所以，无论我写不写文章，写什么文章，在克兄看来，我的左派身份足以让他在“道德”上拒绝与我讨论。克兄的举动，既违反了程序正义（因为我的左派身份而拒绝讨论）又违反了疑罪从无（因为怀疑我与其“价值观”不一致而推定我与其道德观无法交流）这两项自由主义法律观的基本原则。这不仅让人进一步思考克兄自称自由主义者的正确性。

第二，克兄认为我在扎稻草人去反驳不存在的观点，这是错误的。因为就在克兄最新的这篇回复中，他又一次冲击了自由主义的天赋人权观。他认为“人并没有权去要求自己必须得到多少数额的财产”。如果财产没有数额的规定性，那么它就只剩下“财产”的名头，或者说它什么都不是。从克兄上一句话的逻辑出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产阶级的子女“没有权”去要求自己得到父辈遗产的全部或部分。克兄又一次否定了私有财产继承的合理性，克兄后面那句“仍然合理”与其基本逻辑是不相容的。自由主义者有没有讲过“必须得到多少数额的财产”呢？讲过，洛克自己就认为，无代表制度而恣意征税的政府就在侵犯个人“必须得到”的财产的权利。同时，他还认为，财产权作为人权的一部分，是个人活动的延伸，即个人生产劳动的延伸。按照天赋人权，一定数量的个人劳动产品在未经个人同意的情况下，“必须”归属个人，而不应被政府无端征

用。所以，是克兄自己又一次否定了天赋人权，而我所反驳的不是我的虚构，而是克兄“自己持有”的观点。

第三，克兄认为人类“完全拥有理性”，并且人类“对自由以及个人权利的追求是永恒不变的”，尤其是克兄“不会去宣称任何理念是必然会随着历史进步而被抛弃”。同时，克兄又认为，社会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慢慢地测试、选择、比较不同的政策、理念”来加以“改良”的。这又是对自由主义人性观和制度观的背离。如果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在“测试和选择”不同的“理念”时，抛弃了过去一直持有的某些理念，那只能说，这些理念不符合今天“对自由以及个人权利的追求”。那么为什么过去的自由主义者会持有这些今天被放弃了的理念呢？按照克兄的说法，只有三种可能，要么过去的或者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不“理性”，无法正确认识何为自由，这就与自由主义的认识论相矛盾；要么对人类自由以及个人权利的追求是变化的，可能未来社会的自由会超越消极自由的狭隘内容，这就与自由主义的自由观矛盾；要么是有些理念“必然会随着历史进步而被抛弃”，这又与克兄认为的自由主义的历史观相矛盾。所以，在探讨历史“线性”与否之前，克兄先应该解决自己的自由主义到底应当如何理解历史的问题。

第四，克兄觉得受了委屈，认为我想证明他的“无知”，并且“享受”此番过程，这显然误解了我，也误解了一切真诚的马列主义者。与观点不一致的人相互讨论乃至相互批判都会有益于推动历史前进。我们马列主义者从不以让别人痛苦为乐，也从不通过羞辱别人来找优越感。但是有些不严肃的自由派（这里不包括克兄）就不一样，我听说某个自由派论坛就把关于我写的东西的讨论（包括克兄严肃的回帖）给放到了“欢乐恶搞”区，且并没有给出值得一提的解释。这实在让人遗憾，我们双方的文章都是认真严肃的，我们对政治理论的讨论深度要远超一般自由派的水准，他们中的多数除了谩骂什么都不懂。他们把我的文章扔进“欢乐恶搞”区，这不奇怪，历史规律在发生作用，部分中国的自由派在他们的衰落期用“欢乐”掩饰自己的恐惧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是他们把主题之下克兄的讨论也归为恶搞，就确实不地道了。我曾经也是自由派，当年自由派“民主之后杀全家”的集体癫狂让我退出了这场自我陶醉的闹剧。不过我们的讨论如今落得如此待遇，确实让人不得不思考，中国自由派的主流，比起十年前“民主之后杀全家”的时代，究竟有没有半点进步。

美国很强大，中国决不挑战 —— 唯有珍惜改革开放 (2020年1月14日，原载《环球时报》)

胡锡进

刘鹤副总理星期一已经率团前往美国，中美将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美贸易战打了22个月，这个时候好好来看一看美国和我们自己，以及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老胡觉得很有必要。



首先，老胡想总结，美国很强大，特朗普总统出手凶狠。美国有力量也有意志把强硬的对华政策推行下去，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是全面的，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了。而由于中国的综合实力弱于美国，决定了我们在对美关系中的整体防御态势。

第二，美国的实力优势不意味着它能够将中国的国家利益随意推倒。这场贸易战恰恰证明，中国比我们自己原来想象的也要强大得多。或者说，这场贸易战首次向中国人验证了自己国家的惊人力量。我们的经济在平稳运行，科技进步因为受到刺激而加快，社会团结没有被击垮，反而有所加强。中国能在美国的全面压力之下如此稳健，让很多中国人有了更多信心。



要看到，虽然美国强大，但它的力量远远不够支持它以帝国的方式统治整个世界。美国无法做到以它希望的方式搞定朝鲜和伊朗问题，在盟国中也经常碰各种各样的钉子，就是这个道理。美国要计算斗争的成本和收益，当成本大于收益时，它就可能选择妥协。



中国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挑战美国的全球利益，我们做不到在对美关系中走攻势路线，但在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方面，中国的实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宽裕。我们可以动员起来守护

国家利益的资源，以及我们为了核心利益敢于付出牺牲的决心，还有我们可以在斗争中让美方付出代价的能力，都是让美方不得不认真顾忌的。

第三，这场贸易战让中国社会更加珍惜改革开放了，我们更加了解了，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的不二之途，而只有深化改革才能支持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

要说，这场贸易战给中国增加了前所未有的负重，但不知为什么，老胡并不真恨这场贸易战，我觉得它带来的触动很可能会促使中国变得更强壮，更经得起摔打。大国就得能扛事。如果我们接下来的应对愈发准确，真正做到既坚决维护自己的利益，也能够与美实现斗争中的相互妥协，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长期保持清醒理性，避免因为斗争而出现一些思想领域的极化现象，那么这一切很可能最终被证明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利大于弊。

希望老胡的这些总结和你想的差不多。

本人躬逢其盛的几次左派浪潮 (2020年1月24日)

守门老鸨

第一次是 08-12 年，当时网上活跃的左派是毛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的大联盟，如乌有之乡、毛旗帜、四月网、自干五辟谣联盟等。他们的共同点是相信郭嘉，倾向于认为和右派辩论就是实践理想的最好方式，然后就有了三一五反革命政变。

三一五反革命政变对于左派的教育意义是深远的，因为它意味着顶层连一些温和的改良都无法容忍，视之为问个余孽。更何况顶层不但封锁了左派媒体，而且封锁了四月网、中华网之类民族主义倾向的媒体，这样顶层投降带路并且不允许人民大众不投降不带路的面目也就昭然若揭。这样依靠上层的路线也就不能不破产。12 年前的泛左联盟的精神继承者，大约也就是兔漫粉丝、小粉红一类少不更事者，继续做着大国迷梦之类的幻梦。

第二次是 13-15 年的少年中国评论 (YCA)。这群人大多是年龄较轻的城市白领，他们的长处在于对阶级固化认识比较深刻，短处在于剥削社会习气重，有小圈子抱团排外倾向，态度傲慢。他们较第一波态度已经远为消极，指望技术进步导致资本主义社会自动发生危机，引发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唯生产力论，所以也就重视脑无（脑力无产者），轻视体无（体力无产者）。后来也是因此分裂为马前卒派（纯工业党）和王小嗨派（介于工业党和正统马主义的中间派）。马前卒（任冲昊）本人是观察者网主编，走上层路线，是半国家主义半左派、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江湖人物。右边的基路伯（周恩捷）也放话要巴结上层社会搞事。他们这样的上层路线、江湖作风，后来也就逐渐沉寂下去。

第三次是 16 年开始，有两类人是同时的：第一类是和 YCA 出身差不多的青年左派。这些人我接触过一些，鱼龙混杂，很多只是玩票，言语间还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对于革命只是想着放长线钓大鱼而已。但是也出现了八君子这样敢于迎身而上的进步青年。对于他们为什么态度比之前的 YCA 更激进，甚至行事处

处与 YCA 相反，我关注不多，不得而知。据我所知，他们的同龄人大多是非常势利的，比八零后更势利，至于他们为何选择在这样一个时代抗争，为何比前辈更激进，也许只是因缘际会吧！他们的行动，可以说是以卵击石的抗争，当然我不能不致以敬意，但也只是如此而已。

当然也有比较不干净的，我怀疑贺鹏超作为前山鹰社社长、得到两总理接见、社会荣誉一箩筐的人物，为何转行左派事业，动机有点奇怪。按理说，这种人应该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如鱼得水的“才俊”。遇到挫折、转行左派追名逐利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相信他们中动机善良的多，不然做不出来这样的事。

第二类人是微博上的左派，年龄二十多到四十多都有，跟风附和的很多。主要特点是受过刘仲敬影响，崇拜“传统”，反感女权、西方新左等，但对社会矛盾、阶级固化有深刻认识。这类人和前三类相比，对社会的认知处处不离开自己的具体经验，因此对马列毛无兴趣。他们大多也有过思想极右的经历。他们的认识转变，也可以说明公知的舆论宣传在大众心目中的破产（特朗普不合乎自由民主教条的大量政治举动更加强化了这一点）。他们虽然没有多少平等意识，甚至反对平等，但是基本上拥护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体现了一定的阶级觉悟。

以上就是我这些年见到的网络左派。我认为从历史上看，左派运动是一波接一波的，而且下一波未必就是上一波的人。至于下一波会是什么样，只能拭目以待吧！就写到这里。

武汉疫情亲历记 —— 对于吹哨人假设的推演和复盘

(2020年4月12日，原载风闻社区)

老田

本次武汉疫情期间，有关吹哨人的舆论风潮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依据这个假设：如果听信吹哨人提供的信息并及时做出决策，就可以避免后续大部分恶果。实际上，依据孤立信息做出正确决策还能够全部实施，解决大部分或者全部问题，这个想象力实际上是一个反向构建的“官场超人”假设。我们今天有条件对吹哨人隐含的“官场超人”假设，进行一次事后推演和检验，看看避免大部分恶果的官场超人在现实中间是否能够存在。这个推演和检验，之所以值得做，可以借此检验出今日中国舆论场合的意见生产，以及相关的接受机制中间的某些隐秘机制。

一、有关吹哨人假设的事后推演

有关吹哨人的舆论狂欢，席卷了中国高端知识精英的大部分，应该说，此种状况近乎完全反智。

老田在很小范围内跟朋友一起推演过：如果我们带着今天对于新冠肺炎的认识——极高的传染性和潜伏性、值得付出大代价去遏制，穿越到元月初去找一个官场超人，让他拟定最合理防控措施，能否在武汉避免疫情大爆发呢？结论是：大概率避免不了。

要避免后来的严重恶果，需要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才能在一开始就能够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而做到这一点，依赖于展开针对性的排查和发现病人，以及各种密切接触者。我们事后推演发现，这三个关节点的措施，始终很难贯彻，故官场超人的假设并不能成立，后续各种恶果大部分依然会出现。

一是几乎不可能透过应收尽收而第一时间隔断传染源——首先是提早发现病人以隔离传染源并不现实。目前所知的第一个患者是海鲜市场卖虾的女店主，她病后以为是感冒，到对街的小诊所看病，数次输液无效之后才选择去医院，时间是十一月中旬。在医院辗转求医，也拖了差不多两周，月底才取样送检得到新冠病毒感染结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小诊所接诊阶段只是发现抗生素治疗无效，而最初的那家小诊所接诊过4位患者，最初的第一个星期时间是这样耗掉的。然后在月末的住院治疗过程中，送外地检测发现冠状病毒，但正确的基因测序结果，并不能推断新的病毒的传染特征。而这几位病人，在发病后的两周时间内，均密切接触者众多，估计数以万计。

二是排查密切接触者与隔离观察措施，也无法进行。春节后，在四川和广东开展过大规模排查和追踪，并随后隔离密切接触者进行观察，其依据是确诊患者使用长途交通工具

的实名制信息。而这在武汉近乎不可能做到：最初证实的感染者在潜伏期内，都大量使用过短途的市内公共交通工具，还在人流很大的市场中间活动，密切接触的人数过多，难于追踪、排查和隔离。而人们在市场和短途交通工具中间的活动，均不具有实名性，同一个时点内的空间范围内“可能的密切接触者”数量过大，估计有数十万之多，这就不太可能被追踪到和全部隔离观察。例如一月底在中心医院就医的陈先生，并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他也是在12月中旬就开始发病和求医——从江夏区人民医院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来回溯他的外出行程至11月底，都找不到任何疑点，最后勉强推测可能是在地铁上与病人有过近距离遭遇，这就从反面证明了武汉疫情早期“传播渠道”的匿名性和不可见特点。所以，那些事后在外地证明有效的强有力措施——透过排查做到早发现 and 早隔离，都不可能提前反向抄袭到武汉，进行预先控制，武汉至今也没有做过这样的排查隔离措施，短途交通工具使用者一是具有匿名特点，二是数量过大，这样的排查举措，今天回顾依然做不了。即便我们假设海鲜市场是唯一的传染源，从这个单一地点传播出去的病毒，在密切接触者群体内的传播，依然无法透过排查手段去发现、隔离和阻断。

第一批患者从诊所到医院的求医过程看，都不具备早发现早隔离的可能性，而且没有后来的财政兜底，一般人生病都是到了撑不住的时候才选择去医院，而医院也是在尝试常规治疗手段无效之后，才会选择抽取患者肺泡灌洗液样本对外送检的，这意味着会病人在“病毒一切未知”时期内，在外活动很长时间——包括在医院实现对医护的感染。那个一切未知的时段内，后来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范围和潜在传播范围，都已经很广了。到了12月底，估计潜在感染者，保守估计过千，具有密切接触者的时间与空间条件的人数，估计以数十万计，而且这些人的身份大多无法追索，也几乎不可能被排查出来。也就是说，到了吹哨人得到信息的时间点——12月30日，武汉疫情后续失控的各个关键因素，均已实际存在并散播开来了，还难于用常规手段排查并阻断其后续传播的可能。

第三个最为关键短板，是医疗挤兑和搞摊医院。这个今天回顾，肯定难于避免，要么什么都不说，那市民就还是不重视；要么为提升市民重视，公布病毒传染性和严重性，这样肯定又会有大批感冒发热市民反应过度去大医院排队的——就跟封城令发布后那几天情况一样，交叉感染还是会大量发生，同时还把医疗服务能力弄摊大半。这个是一两难，始终无法避免，除非事先暗地里完成封小区措施和进行社区排查，这个依据后来的经验——做到这一点没有一个月根本完不成。

所以，有关吹哨人的舆论风潮，及其背后隐含的官场超人假设，对照了确诊病人早隔离、密切接触者排查观察以及封城令初期的医疗挤兑这三个“关键传播机制”之后，就会发现：在武汉疫情早期找不到阻断传播扩大的有效措施。这倒不是任何别的原因，带来后续疫情扩大化的三个内在机制，均超出了政府执行力的最高水平，各种有效措施即便决策出台了，也很难在短期内贯彻落实，故决策是否及时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有的，但并不是决定性的。

不惟如此，今天疫情复发风险仍然居高不下，原因是各种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这依然很难排查出来加以隔离，这个状况与初期的疫情潜在传播风险类似，还是找不到很好的预先处置办法。硬要排查的话，就得搞全民检测，而由于测试误差和假阴性问题的存在，

即便付出巨高成本全测，结果肯定还是无法预先揭露全部潜在风险，故全民检测的措施大概率不会推行。

有人说提前五天或者十天封城会怎么样，这个假定有一点可能成立，但也还涉及到决策是否具有充足依据的问题。如果不是疫情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就不会被浙江的专家李兰娟关注到，也就不会有卫健委的第三个专家组到武汉，更不可能被专家组估算出极度严重性，直接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了。后续决策倒是十分迅速，李兰娟院士接受访问时说，她是 16 日向卫健委提出到武汉实地考察要求，18 日专家组到武汉，次日闭门会议上李兰娟已经提出武汉“不进不出”的建议，还直接奉召进京向主管副总理汇报并被请到国务院常务会议现场，20 日卫健委公告“新冠肺炎为乙类传染病按照甲类控制”。22 日夜根据浙江本地减少输入的及时把控要求，李兰娟院士把建议提到最高决策层，次日最高决策封城令下达执行。

二、医疗平台服务能力或工业产能才是真问题

在封城令发布之后，最初几天发生过严重的医疗资源挤兑，本地医疗服务能力被搞摊大半，结果医院实际收治能力可能只有病人数量的几分之一，故做不到应收尽收，也就始终无法控制住传染源。

在最初阶段仅开放金银潭医院和肺科医院 800 张病床，集中收治重症病人，中心医院艾芬说重病人转不出去，就是这个时期。后来分批次指定多家定点医院，到第四批医院改造完毕接收新冠病人时期，此时是 1 月 31 日，全部病床为 4000 余张。医疗服务可及性依然下降到只有几分之一，可能四五个病人才有一个人得到机会住院。大量住不上医院患者家属上网控诉的，就是这个时期。

医护感染的派生问题，与大批无症状病人就医有关。1 月 13 日，协和医院神经外科整个手术团队被感染，这在医护人员中间带来极大的心理恐慌，此后一切科室的全部接诊人员都需要穿上一级防护用具，相关需求瞬间上升百倍以上，罗掘俱穷都供应不上，医护人员大量被感染也是在这个时候，李文亮医生也是在一月初被患者感染的。此时实际情况是：确实是真的供不上一级护具，哪怕全球华人帮助在世界市场上扫货，依然填不平巨大的供应缺口，医护确实也处于危险中，但医院是否需要就此停业(当然实际上已经瘫痪了大半)，就成为一个两难选择。

政府介入之后，强势地采取各种措施去暴力提升产能(包括还安排军工厂转产防护服)，最后在 2 月 10 日前后，逐步填平防护物资供应缺口，这个对于工业产能的时间段考验，虽然未能立即就满足供应要求，但成绩尚可。当今世界，实际上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短期做到这一点，这个方面的表现也一样不反映官府说的制度自信，而是直接取决于相关制造业基础与规模。但此前，媒体已经借此大好机会，彻底黑了一波武汉红会，红会恐怕各种问题都有，但防护物资短缺确实不是他们的锅。

事后回顾，武汉医护人员感染人数过多——高达 1700 余人，其关键原因在一级防护具不敷供应的那三个星期时间内，是否坚持医院继续开业和收治病人，若是，则感染数量大的结果近乎无法避免。按照武汉医护人员大批感染的教训，凡属潜在感染者过多的城市与国家，应该全部医护均着一级防护具上班，但这样一来，短期内的供应缺口就会十分巨大。如果安排一个全球防护具供应能力提升比赛，中国肯定第一，这也不体现制度优势，而是源于制造业产能的实际状况。

短期暴涨的需求无法迅速被满足，才是真问题所在。防护具短缺严重存在于一月底二月初，等到 3 月初的时候，就看到防护服产能过剩，产品滞销的报道。医疗服务能力也是如此，最初阶段严重不足，各种暴力提升的需要都纳入考虑，2 月 3 日第一个方舱投建，3 月 10 日全部方舱医院休舱，然后 3 月 20 日开始逐步撤出近 6 成的医疗队，部分医院逐步地退出发热门诊恢复常规病患救治业务。

今天回顾，武汉本地执行力长期提不起来，才是真问题和短板所在。切断传播路径的封小区措施依赖第二生活物资供应渠道，这个差不多花了一个月建设才初步顺畅起来。而控制传染源的能力提升，则完全依赖全国征调医护力量支援湖北，2 月 8 日开始“一省包一市”以暴力提升服务能力，也花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才弥补上服务能力相对患者数量的巨大缺口。等到医疗服务能力，真的提高到能够应收尽收，疫情管控就走出了第一个阶段了。在 2 月底基本上能够应收尽收，此时才第一次真的能够做到控制住传染源了。

所以，真要找官场超人，可以超越或者填平一切服务能力缺口去解决所有问题的，那就只有一个：他日常蹲在北京的中南海，还应该是集体形象才对。

看起来，有关吹哨人的官场超人假设，纯属想当然，其唯一利用价值在于据以批判官场无能和失德。在现实世界中间，官场超人依据有效信息做出即时决策避免大部分恶果的假设，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够成立，不管是传播途径切断减少初期感染者数量，还是短期内提升服务能力达到“应收尽收”以切断传染源，都是无法做到的。实际上，连那个减少医护人员感染的小目标，也有待于提升防护具工业产能提升之后，才能够避免，要不然就只能选择医院关门。不过，医院关门不算是个好方法，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没有选，哪怕西班牙医护感染近万，依然没有选择关门。

三、民怨的焦点问题：抗疫期间的医疗服务能力缺口及其表现

在病毒传播过程中间，武汉大爆发的大多数后果，可能是难于避免的，当然卫健委和官场的渎职和滥权，使得武汉在应付这个病毒期间付出了过高代价。这主要也表现为体系服务能力缺口问题，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病患过多，收治能力在一月底时期可能只及实际数量的几分之一，导致大量病人窝在家里，还往往发展为重症和危重症；二是医院的技术条件和照护能力没有跟上，一些重病号由此丧失了康复机会，这里头有部分客观原因可以讲，例如装备不足、医护过度疲惫且由其他科室转入缺乏经验等，但病人没有得到合理的医疗条件和照护水平的后果不会变；第三是执行能力提升缓慢，不管是控制传染源还是

切断传播途径，都比较拖拉，到二月底才基本上把两个方面的执行力条件预备好。这两个条件一达到，特别是应收尽收一达到，疫情就算是初步管控住了。

此外，由于医疗服务能力不足，还带来一个派生问题，武汉大批医院先后转为发热门诊收治新冠病人——最多时有 44 家医院转向，其他各类病人丧失了就医机会，这个派生问题引发的次生伤害也不小。

方方等人的鼓噪，能够吸引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吻合了“医疗服务可及性的迅速下降、服务水平下降幅度很大、很长时间无法弥合服务缺口”这三个方面的实际，但她的解释是扭曲的——统统解释为政府和医院的冷血和不作为，或者凭空说成是贻误时机所致。公知们的言论，选择性遮蔽服务能力缺口的存在，同时遮蔽了可归因于政府“执行力不足”方面也是一个阶级问题——按照北大教授潘维的说法就是四十年来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烂根”和“国民党化”了，这样才会导致领导跟群众很长时间对接不上，导致切断传播途径的进展很慢，如果单位制的熟人社会还普遍存在就肯定很不一样了。同时，公知们也不承认医疗行业的利润逻辑，事实妨碍着政府指令的通行和效果——医院要等到宣布财政保底之后才放弃治病先拿钱的惯例。而且，执行力还体现为无法进行病人分流，集中医疗资源优先满足危重患者救治，大批轻症患者涌入挤兑医疗资源带来的后果也很严重，这也是医患信任赤字巨大带来的恶果。

如果仅仅就武汉抗疫期间的医患关系检验，这样我们会看到有三个层次的医患关系存在：方舱医院的医患关系是最好的，因为轻症病人生活能够自理，照护水平是否充足，不带来差距；外地支援的医疗队的照护水平高于本地医护，这个原因也容易理解，大多医疗队来自 ICU 和传染科(据说全国 ICU 力量被征调过来十分之一)，原本一贯就是要照护病人生活的，一个上海护士小姐姐说他喂重病号吃一个包子一碗稀饭花了一个多小时，这个别的科室转过来的护士恐怕很难做到，她们平时都不照顾病人生活的，都是家属照护；所以，医患关系满意度最差的，就是本地医院转科接诊的医院了。此外，医疗条件不足和照护水平不足，同样带来的严重影响，各医院都收治了过多的病人，技术设备跟不上，该上呼吸机的没有设备可用，甚至吸氧设备早期在一些改建医院都很缺。除了医护力量跟不上之外，还遭遇到个人能够承担的工作强度的下降——穿上一级防护服之后人的体能精神状态都下降很多，估计能够维持住平时七成工作量就很不错了，这样一来，对病人的要求，回应就不够及时和周到。

这些不足，其中有些是难于避免的，但问题和后果都呈现为：服务不及时和不到位。方方们就是拿这一点做文章的。如果卫健委公开地讲述这些方面的缺口的实存状况，相信绝大多数民众还是通情达理的，不会过多地怨天尤人，一些公知想要把民众的怨气带偏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但卫健委坚决不说，打死也不说，这就助长了公知们的气焰。

然后，最新的炒作是说排队取骨灰盒，多少多少人失去了亲人，这个也算是事实。但对于事实的解读，却埋伏和扭曲了很多。武汉市人口过千万，按照人均寿命 80 岁计算，月病逝人口也会过万，寒暑季节还是一年中间的死亡率高，新冠死亡人数只占总数的极少一部分，当然还肯定有受新冠疫情影响就医不及时而提前去世的。照说这个方面的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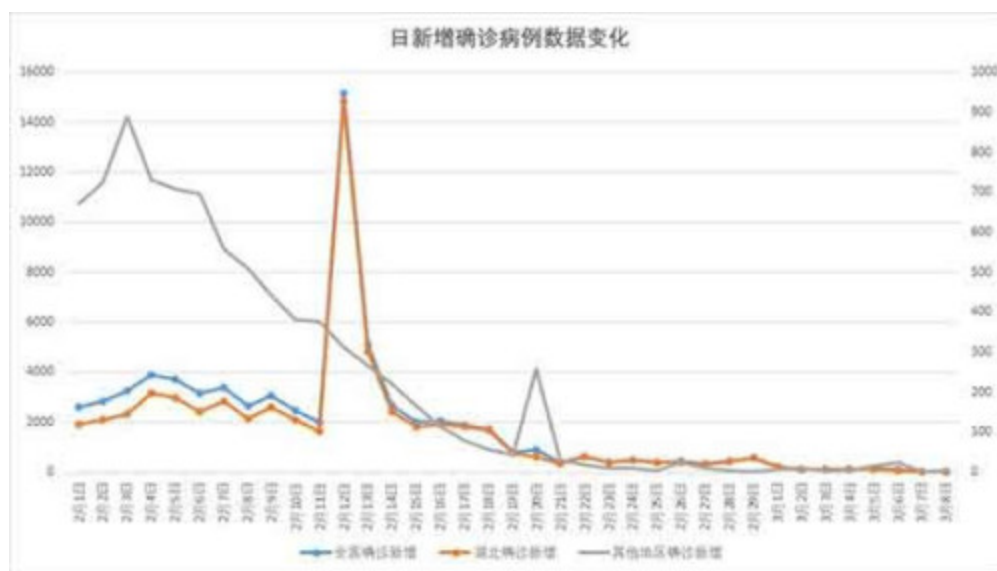
没有任何忌讳可言的，但也完全不予发布，然后坐看公知们进行扭曲解释和带节奏，所以，很多“惯常”沉默的背后，说明内部很多怪异之处。

方主席一类的公知言说，说白了，就是代表钱家要放火烧了赵家的房子(因为赵家已经被他们彻底蛀空了)，然后利用一切机会见缝下蛆给赵家拉仇恨，赵家里面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恐怕也不少，除了渎职滥权不干正事的人之外，明里暗里帮助和纵容方主席的人，看来也不会少。

四、抗疫决策与官民互动效果考察

武汉封城举措，才是真正具备了“吹哨人”特征的短期最大化效果，在看到了中央下了武汉封城这样的最高决心之后，各地官员相当于被解除了全部政治上的后顾之忧——肯定再怎么都不会错的，同时武汉的严峻形势也最大化了官员们内心的重视程度，两者结合，就敢于采取最尖端措施，放手进行本地防控，基本上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个才算是吹哨人的应有效果——最大化行动能力，苏浙沪尤其明显。

我早期看到外地的一些措施还认为有点过火——湖北特别是武汉牌号车辆一下高速就被管制住，还有位货车师傅抱怨说他的车到处都不让出高速，这都还是在春节假期间，除掉这些不足与过火，最后证明各地的控制效果也都还可以的。



推测武汉的实际感染病例数字有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2月12日的突增并非实际如此

这样一来，全国范围内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落差和对照：武汉市的疫情非常严峻并逐日恶化，大量患者无法收治，窝在家里造成聚集感染，患者数量天天增加，部分人由轻症向重症发展，越来越超过服务能力。但是在湖北以外地区的控制效果，却短期内就最大化了，在封城令下达第 12 天，外省新增病例数就开始反转并迅速下降，故能够放心抽调各地医疗队驰援湖北和武汉。

之所以等到 2 月 8 日开始大力执行“一省包一市”，除了春节假期隔断和延误之外，也兼顾了外地防控效果的初步观察结论——各地大体上步入可防可控的状态之后，开始相对放心地大力抽调医护力量出援湖北。23 日武汉封城到 2 月 8 日开始“一省包一市”，期间间隔了 16 天，恰好是一个隔离周期(14 天)多点。

封城决策确实有效，但牵涉巨大，决心并不容易下，实际上也有许多公知大腕在明里暗里攻讦。所以，这个决策方面其实也存在着两难困境：如果不是疫情严重到了一定程度，最高决策介入就缺乏依据，但到了具有足够依据启动最高决策那个时候，介入在时间上就肯定相对拖后。

从决策角度看，封城令很关键，解除或者集中了政治场域的风险于顶层，最大化了官场的执行力，造成了最小化外地感染的结局，湖北之外地区迅速达到可防可控状态，才是能够集中全国力量救治湖北疫区的先决条件。此中，中央政府的主动性大于地方，地方政府主动性大于医疗体系。

对照而言，意大利伦巴第地区封锁令失败了，结果疫情蔓延到了全国，要不然就不会今天这么惨了，要是更早些动手且得到民众配合而成功，那他们也有能力集结全国医护力量，去打救伦巴第一个地区的。意大利封锁令失败的关键，就是缺乏民众的自觉配合。所以，封城令除了在行政体系起作用之外，还有一个附带的巨大宣传效果——借此把民众心目中的警戒水平提升到最高限度，然后求得民众的主动配合与支持。

所以，中国封锁令成功的关键，是得到了全国民众的主动配合，故封锁令的执行效果极好，要是西方民众那种“吊儿郎当”的状况，恐怕也很难达成目前这个相对好的结局。从这个地方看，中国的优势最主要是个人性的——主要也是源于基础平台的特点，大多数民众都服膺于科学防疫要求，市民的自觉配合宅家和出门戴口罩——不仅是保护自己也服务于护佑他人，这个与西方人一比较，差距就格外显眼。

同时，中国的医护人员不管是否真心自愿，只要是没有逃避到疫区支援，就已经很不错了，等同于轮到他们上战场的时候，都没有逃避，所以才能把一场疫情控制战役打到了今天这个结果，这个应该高度肯定。岳飞说过“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这个近似于上战场，确实有很高风险，但他们没有选择逃避。

孔夫子还说过“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确实大多数医护人员做到了，等到他们自己应该担负起来的时候，担当都还是不错的。虽然平时医患关系不佳，整个医护队伍通过武汉战役的检验，还是得到民众信赖和肯定的，这说明是异化的医改方向制造了医患对立一

—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恶劣体制的问题，这一点发现也很重要，现在迫切需要考虑：如何才能逐步撤除错误医改方向塑造的、在医患之间制造无穷对立的异化医疗体制。

五、国际比较的一些显而易见的结果

武汉疫情初期是否可控，其内在机制并不复杂，尤其是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的种种措施，均在人们日常经验和常识范围内，只要认真思考就能够做出相对靠谱的判断。但是，相当多的人，特别是一些自视甚高的知识人，却拒绝运用头脑思考这个严肃的具体问题。

在相信和吹嘘吹哨人的背后，是隐蔽召唤出一个官场超人形象——这个超人能够就一个很有限的信息做出正确决策，避免后续大部分恶果。问题是，这个超人可能在现实中间存在吗？知识精英号称一个民族的头脑，但恰好中国的这一批知识人的惯常选择是：拒绝运用他们的头脑。此种状况的大面积存在，确实意味着整个儿的官场也好不到哪里去——毕竟官场成员都是从教育“生产线”上“透过机械复制程序”下来的产品，不可能完全摆脱学校塑造的缺陷或特点。

事后回顾，不管是疫情初起的控制传染源和阻断传播途径，都很难在现实中间实现，吹哨人假设的官场超人在现实中间不可能出现。除了封城与封小区这个极端选择之外，民众中间感染扩大的路径很难阻断，但要成功做到封小区，所花时间今天去做也不会更少（武汉花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才建立起网格生活物资供应渠道然后实现封小区）。哨声一响，效果立见的可能性，在现实中间并不存在，现实中间能够起作用的，就只有各种人力物力资源调度方案及其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达成预期效果。

不要说全面阻断民众中间的隐秘传播路径，就算是武汉医护人员感染人数过多——高达 1700 余人——这个更小的具体问题，现实中间也没有太好的答案。其关键原因在一级防护具不敷供应的那三个星期时间内，是否坚持医院继续开业和收治病人，若是，则感染数量大的结果，就近乎无法避免。按照武汉医护人员大批被感染的教训，凡属潜在感染者过多的城市与国家，全部医护均应该着一级防护具上班，但这样一来，短期内的供应缺口就会十分巨大，持续多长时间不敷供应，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产能提升速度。如果就此安排一个全球供应能力提升比赛，中国差不多花了三星期填平缺口，这个成绩肯定全球第一，但这也不体现制度优势，而是源于制造业产能全球第一的现实。

现在美国也做了同样的选择——强硬要求医护人员在缺乏合适防护具条件下上班，估计医护感染数字肯定会大于中国，持续时间也会更长。这其实都是同一个选择：没有一级防护具医院要不要关门？不选择关门，就会出现大量被感染的后果。西班牙不是医护感染近万吗？这个数字还在天天扩大，肯定还会持续更长时间，这中间没有任何别的原因，他们的制造业基础远不及中国。

说到底，不加思考的地胡喷，说到底还是人品决定的，无关立场左右，通情达理的正派人不会过分去纠结某个具体的“岔子”不放，拒绝观察全局和进行合理对照，再给出全

面的评判。而总是揪住“岔子”不放的人，多半也会同时拒绝运用头脑思考问题。在这个方面，泛左翼的表现远好于右翼公知群体，这并非简单意味着立场优胜，而是平均人品得分领先。

而死抱住官场超人形象不放，振振有词地批判别人或者官府的人，其实不过是一帮子试图道貌岸然地装一把正义的喷子而已；在较为隐秘的内心里，还偷偷给自己发放了一块智慧无双的奖牌——我发现了一个原本可以避免重大损失的高招，我是多么的不同寻常啊！无论是道义地位装叉，还是假装高明，都是一种隐秘的沙文主义心理作怪而拒绝运用头脑。

说白了，这种死抱住官场超人形象说话的知识人，不过是潜意识里自己给自己构建道义高位和智慧高位而已，体现的恰恰不是他妈的道义和智慧，而是群体性的异化——他们已经异化到了拒绝运用头脑的高度了。在这些人异化的头脑里，信息和正确决策，自身就足以决定一切了，似乎精神直接就能够干预物质世界了，现实中间的人力物力资源调度和运用的实际可能，似乎变得可有可无了。这只有传说中间的神仙，才真的可以免于物质世界的约束，可以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无需思考物质世界的执行力或者产能缺口问题。

说到最后，那些吹嘘吹哨人的知识人，实际上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去思考物质世界的问题解决方案，甚至还没有真正具备在现实世界提炼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种浮夸的风气在知识界里大范围存在，才会制造出此种毫无头脑和毫无节制的舆论风潮。在这个风潮的反面，也揭示出官学两界的实际能力到底咋样了——他们都是同一个教育体系和同一个教师群体教出来的学生，眼高手低且满嘴胡喷的是绝大多数，官场也不见得更少只是表现机会没有学界多罢了，这才使得整个抗疫成本没有下降到合理程度。

不是官场不存在问题，但问题不是吹哨人狂欢指出的那一个问题，而是反过来，愚蠢的吹哨人狂欢才是真问题所在——是知识人头脑无能这一实存状况的自我呈现，这个状况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官场和医管与疾控中心等相关机构中间。这才是解决问题能力不足的深层次原因所在——一事当前不是务实地去解决问题，而是先想着表现一把自己顺便捞点私利，知识人的吹哨人狂欢(秀无脑的正义感)，疾控中心的专家们赶着发英文文章，官场秀政绩秀能力或者报喜不报忧，就是很少人关注如何认真解决真问题。

官场是存在着严重的投机或者机会主义的，医管体系和疾控体系同样如此，但是相比较鼓噪起吹哨人狂欢的媒体和学界而言，前两者的机会主义远没有那么严重和露骨。

依据老田的判断，鼓噪出吹哨人舆论风潮的媒体和学界，才是全中国投机性最强最顽固的群体，没有之一。

黑人的命贱还是警察的命贱？ (2020年8月29日)

第三小提琴

自今年5月底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杀以来，美国社会撕裂、政局动荡，在西雅图市、芝加哥市、亚特兰大市、俄勒冈州、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等地发生了广泛持久的大规模骚乱，其他各地的社会治安也普遍恶化，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出现了瓦解的迹象。

怎样看待目前的美国政治和阶级斗争？骚乱爆发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控制的主流媒体众口一词，认为黑人被杀，是美国“系统性种族主义”的见证，骚乱是对长期深刻的种族压迫的自然反应，是对特朗普政权煽动种族仇恨的抗议。美国小资产阶级各“进步”派别（包括各种边缘化的托派、“毛派”团体）也纷纷呼应。

国内社交媒体对美国目前事态的报道和评论，往往是照搬美国主流媒体的态度。至于像乌有之乡那样的进步网站，由于不了解美国的实际情况，在评论中常常想当然地认为，当前美国的群众运动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及其以前的反对种族主义压迫斗争的继续。

那么，美国的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些美国政治中的诡异迹象。自5月份以来，美国各地频频骚乱，不仅攻击各种政府建筑物，而且伴随着大范围的、盲目的打砸抢烧，不仅破坏大公司和奢侈品商业区的财产，而且烧毁了大量普通小业主和劳动者的商铺、生活设施，杀人案暴涨，数以百计的人死于无辜。

照理来说，所有这些行为都严重破坏了资本主义的正常经济和社会秩序，资产阶级应该强烈反对、坚决镇压才对？然而，奇怪的是，美国资产阶级控制的各个主流媒体对于遍布全国的骚乱，不仅不反对，而且不着急，而且还推波助澜，将骚乱美化为“大多数人还是和平的抗议”；当特朗普政府在骚乱初期考虑动用联邦军队时，从国防部长到军队各将领，都公开表态拒

绝执行。难道骚乱直接威胁的不正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吗？美国资产阶级这样说、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愚蠢吗？是因为他们没有历史和政治经验吗？

更加奇怪的是，对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和其他抗议者、骚乱者提出的取消对警察拨款乃至废除警察的口号，民主党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主流媒体也态度暧昧，若干市长、州长甚至公开支持这一要求。似乎资产阶级及其政客不再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关心起黑人的命运来了！难道警察不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吗？美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心甘情愿地要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还是美国资本家都准备改行做共产党员了？

对于这些问题，笔者准备分几期、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撰写若干篇短文，来介绍和评论当前美国政治中的一系列诡异现象。如果因此引起一些讨论，乃至于大批判、口诛笔伐，笔者也乐于奉陪。

今天先说说，美国到底是不是存在着“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如果有，到底表现在哪里？我们知道，历史上，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确实曾经长期受到种族主义的压迫。美国南方的奴隶制种植园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中期。自那以后，在美国南方各州，还长期存在着种族隔离的制度。但是，经过美国各族裔人民的长期斗争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斗争以后，今天可以说，在美国，无论在联邦还是在州及以下，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一般的就业市场上，公开的、制度性的种族歧视已经不存在了。不仅不存在，美国还有着各种各样的、世界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目前不具备的对黑人和少数族裔、妇女、各种性取向乃至其他身份特征的法律的和政策的保护。

这当然不是说，美国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特别是其中的劳动人民，就不受剥削和压迫了。凡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民都必然受到剥削和压迫。但是，在现在的美国，到底有没有独立于阶级剥削和压迫以外的某种特殊的、单独存在的、抽象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如果确实存在，对黑人和其

他少数族裔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是不是就值得人们无比愤怒以至于动不动就烧掉几条街？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如果在今天的美国，确实存在着某种独立于阶级剥削和压迫以外的特别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压迫，它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总要有它特定的物质基础。认为白人劳动者一生下来，或者仅仅因为被白人教会洗脑（远比不上资本主义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身份政治”的洗脑），就莫名其妙地要歧视、压迫黑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动的唯心主义。

那些认为今天的美国仍然存在着“系统性种族主义”的人，一个主要的论据，就是认为警察对黑人滥用暴力，是当前美国种族主义压迫的一个突出表现。在很多声情并茂的叙述中，似乎美国黑人从小到大都时时生活在警察压迫的阴影下，乃至随时会被警察滥用私刑、丧失生命。这样的现象，肯定是存在的，但是不是美国黑人受压迫的一个主要的或者虽然不是主要的但仍然是相当重要的原因或表现形式呢？

让我们就从“黑人的命也是命”这句口号说起，这是当前美国群众运动中标志性的并且一度赢得广泛同情的口号，也是感动了大批中国的小资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口号。这句口号背后的含义就是，美国的警察不把黑人的命当命，并且这是黑人被压迫、恐惧、愤怒的一个主要的或者重要的原因。

让我们先来看一些统计数据。据美国 Statista 网站关于“犯罪和执法”以及“警察暴行”的统计数据，2017 年，美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打死了 457 名白人、223 名黑人；2018 年，美国警察打死了 399 名白人、209 名黑人；2019 年，美国警察打死了 370 名白人、235 名黑人。大致来说，每年死于警察枪击的白人大约是死于警察枪击的黑人的两倍。

但是，美国白人的人口大约占美国总人口的 70%，而黑人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 12%，白人人口大约是黑人人口的六倍。所以，如果按照占人口比例来说，黑人死于警察枪击的概率要更高。据统计，从 2015 年至 2020 年 7 月

（在累计五年半的时间里），每一百万黑人中有 31 人死于警察枪击，每一百万白人中有 13 人死于警察枪击。黑人被警察枪击死亡的比例是白人的两倍半。这是不是足以说明在美国警察执法和施用暴力的过程中，对黑人存在着明显的种族歧视并且不把黑人的命当命呢？

根据美国全国的逮捕记录，2018 年，美国警察因犯罪共逮捕了 1031 万人次，其中白人 712 万人次、黑人 283 万人次。白人犯罪总数大约是黑人犯罪总数的两倍半，与上面白人和黑人分别因警察枪击而死亡的比例大致相当。但是，如果我们单看最严重的杀人案（包括故意杀人和重度过失杀人），美国警察在 2018 年一共因杀人案逮捕了约 12000 人，其中白人约 5300 人、黑人约 6400 人。就是说，黑人是凶手的杀人案占了美国全国杀人案的半数以上。

这些统计数据，当然不是说黑人本性就特别凶残或者特别爱犯罪，而是说，黑人死于警察枪击的比例较高，完全可能有除了所谓“系统性种族主义”以外的原因。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必然造成相当一批劳动人民生活贫困和痛苦之中；由于历史的原因，黑人在贫苦劳动人民中的比例较大，并且客观上造成黑人的犯罪率更高、恶性犯罪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2016 年，大约有 2900 名美国黑人死于杀人案，其中约 2600 人死于凶手是黑人的杀人案。前面说，在五年半的时间中，每一百万黑人中有 31 人死于警察枪击，就是说，平均每年，每一百万黑人中大约 5 人死于警察枪击。相比之下，每一百万黑人中每年大约有 70 人死于杀人案，其中 65 人死于黑人是凶手的杀人案；这个比例是死于警察枪击比例的十倍以上。

如果我们真的认为黑人的命像所有其他人的命一样宝贵，那么现实生活中对美国黑人生命最大的威胁（就非自然死亡来说），绝不是警察暴力，而恰恰是黑人社区内部的犯罪！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的方法当然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近期的方法，除了加强（而不是削弱）警察执法以外，只

能靠黑人群众自己努力清除自己社区中的犯罪团伙和其他败类。而号称黑命宝贵的美国各主流媒体以及各种小资产阶级伪左派团体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不置一词，也没有任何有效的努力。

有的读者可能要问，即使暂时解决不了黑人社区的犯罪问题，通过“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制止警察滥用暴力，减少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对无辜生命的伤害，减少弗洛伊德那样的悲剧，难道不好吗？

关于这些问题，笔者会在接下来几篇随笔中继续阐述。这里，先给个结论。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下，上述的良好愿望完全是既无生活经验也无政治经验的小资产阶级玻璃心的空想！

我们知道，在美国，私人是可以合法持有枪支的，这一项权利是美国宪法修正案的第二条，没有极大的政治动荡，是不可能改变的。

前面说，美国警察每年大约打死 200 多名黑人。这些被打死的黑人绝大多数是犯罪嫌疑犯，有的是正被通缉的罪犯。我们无法一一评估这里每一个案子中警察使用致命武力是否合理。但是，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的数据，在 2015-2018 年期间，因美国警察枪击而死的嫌疑犯中，92%在当时持有武器。所以，可以认为，在大约 90%的情况下，被警察枪击致死的罪犯或嫌疑犯确实对警察或对公众构成了相当的威胁，或者至少警察可以有理由这样认为。

那么，罪犯对警察安全的威胁是不是夸大其词呢？在很多情况下，如果警察不要那么着急开枪，是不是就能多拯救一些无辜生命（或者虽然“有辜”但罪不至死的生命）呢？

有这样设想的朋友，大概以为美国的罪犯在警察面前一个个都是十分温顺，如待宰的羔羊般等候警察决定自己的命运？

据美国执法官员纪念基金会的数据，2009-2018 年期间，美国每年大约有 160 名警察因公死亡，其中 53 人是在执行公务中被枪击而死亡。

美国有多少警察呢？大约 80 万。就是说，美国警察平均每年因枪击而死亡的比例是每一百万警察中 66 人；这是平均每年每一百万黑人因为警察枪击而死亡比例的十几倍！

在美国，到底是黑人的命不值钱，还是警察的命不值钱？！到底是黑命贱，还是蓝命贱？！（美国警察穿灰蓝制服）如果按照“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逻辑，可不可以说美国警察才是“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受害者？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美国当前的群众运动？美国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怎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运动？怎样看待特朗普政权？美国此次大选对美国和世界将有怎样的影响？笔者将在以后的随笔中逐次讨论这些问题。

聊聊美国的阶级斗争和两党政治 (2020年9月1日)

第三小提琴

在上一篇关于美国政治的短评（[“美国怎么了——黑人的命贱还是警察的命贱？”](#)）里，我初步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当前美国的警察暴力，并非美国一般劳动群众被压迫的一个重要表现，甚至未必是黑人劳动群众被压迫的一个重要表现；目前正在发展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也并非简单地是历史上反种族主义压迫运动的继承者。

在国内的主流媒体和一般社交媒体中，对于美国政治的分析大体上有两种派别。一是传统的自由派公知群体，他们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将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理想化、神圣化，无视和淡化美国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另一种，是近年新兴起的小资产阶级“进步”派别，他们所借鉴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欧美小资产阶级知识界流行起来的后现代主义和“身份政治”，其特点，是极大地夸大种族、性别、性取向以及其他各种主观认定的身份的重要性，抹杀和掩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矛盾和冲突。在国内，《澎湃新闻》以及与其相联系的知识分子是宣传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群体。

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应该怎样来分析美国政治呢？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的思想武器是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来认识和分析一个社会，首先要了解这个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了解这个社会在这样历史的阶段客观上面临着哪些矛盾，了解这个社会在客观上所面临的矛盾（也就是那些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矛盾）又怎样通过阶级斗争表现出来，这样的阶级斗争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又采取怎样的政治形式。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样的分析方法老套、古板，毫不性感。但是，历史一再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才能引导人们透过阶级压迫的重重迷雾，寻找到解放的正确道路。

就美国来说，无论人们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如何，都不能否认，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了解正确认识和分析美国政治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的发展方向，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前途。

要了解现代美国的政治和阶级斗争，首先要从二十世纪上半期说起。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当时的小政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法有效地稳定总需求，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国际上，由于英国霸权衰落、金本位货币体系瓦解，美国和德国的争霸斗争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斗争日益高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面对重重危机，美国资产阶级不得不对工人阶级做出相当的让步，并对资本主义制度做出重大调整。以 1932 年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并开始“新政”为标志，美国资本主义开始形成一套新的社会妥协体制。在“新政”体制下，美国建立了社会保险和福利国家体制，承认工会的地位。“新政”后的民主党除了主要代表美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以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容纳了以劳联-产联为代表的有组织工人阶级的利益。从 1932 年至 1968 年，在 36 年中民主党执政的时间占了 28 年，反映了“新政”妥协在美国政治中的统治地位。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以后，美国的跨国资本取得了全球垄断地位，通过剥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广大外围地区取得了大量超额剩余价值。这为美国资本主义实行所谓“资本-劳动谅解”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资本-劳动谅解”下，工会帮助资本家维持劳动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回报，资本家许诺，工人的实际工资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将得到稳步和快速的提高。

但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资本主义遇到了新的重大矛盾。在国内，不仅工人阶级斗争高涨，而且在“新政”妥协体制下没有受益的各种群体（如妇女、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要求得到经济和社会权利，这些斗争造成资本家利润率下降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积累危机。在国外，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深陷泥潭。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许多外围国家纷纷

团结起来提高原材料出口商品的价格，限制了美国从世界范围攫取超额剩余价值的 ability。

美国资本主义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危机最终迫使美国资产阶级改弦更张、放弃“新政”社会妥协。以里根上台为标志，美国开始了新自由主义的反动时期。新自由主义的国内政策，主要是削减社会福利，打击工会，削弱工人阶级斗争能力。在世界范围，新自由主义的标志性政策就是“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将大量工业生产能力转移到可以剥削大批廉价劳动力的亚洲国家。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大幅度地增加世界范围的产业后备军，以此来达到削弱美国工人阶级并恢复利润率的目的。到了九十年代，克林顿任总统时期的民主党也完全拥抱了新自由主义政策。

本来，“新政”时代的民主党主要是代表美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如上所述，也部分容纳有组织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从克林顿时代开始，民主党就演变为主要代表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受益的华尔街金融资产阶级和硅谷高科技资产阶级的利益。除此以外，作为民主党选民基础的还有美国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美国的黑人、西语裔等少数族裔。

这里说的“小资产阶级”指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自身劳动过程有一定控制能力的高技能劳动力，比如技术管理人员、工程师、金融分析师、计算机程序员、律师、演员、体育明星、大学教授等；其中与金融业和高科技业相联系的小资产阶级上层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

除了将大量工业生产能力转移到有大批廉价劳动力的地理区域以外，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打击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从国内劳动力市场中进一步动员各种潜在的廉价劳动力（比如女性劳动力），同时以合法或者非法的方式增加来自境外的移民劳动力（比如来自墨西哥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西语裔移民）。这样，就需要一套新的政治话语能够将美国大资产阶级打击工人阶级的真实利益包装为某种可以反映女性、少数族裔要求的意识形态。

于是，后现代主义和“身份政治”便应运而生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世界革命高潮退潮以后，大批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纷纷逃避到后现代主义中将其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所谓后现代主义，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主观唯心主义。后现代主义否定任何客观存在的历史规律，也否定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在政治上，后现代主义与“身份政治”密切相关，将性别压迫和种族压迫以及各种主观想象出来的“身份”压迫拔高到独立于阶级压迫之外单独存在的地位，用夸大的非阶级“压迫”来掩盖和抹杀阶级矛盾和对抗。

这样，到了本世纪初，民主党便成为美国金融资产阶级和高科技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同时容纳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受益的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除此以外，在选举政治方面，民主党则依靠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的绝大部分、妇女和各少数民族裔的多种“身份”联盟。其中，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中下层利益的各种“进步”派别（如以桑德斯为代表的民主党“左翼”和最近兴起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标榜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很大程度上被裹挟在这一联盟中。

美国的工人阶级（特别是白人工人阶级）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主要牺牲品。但是，在2008年以前，虽然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但是靠着借贷消费和房地产泡沫，在生活水平方面还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在2008-2009年经济危机以后，美国工人阶级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了。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幻想帮助奥巴马在2008年当选为美国总统。

奥巴马是当代美国政治环境下最阴险、最狡猾的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他在2008年当选总统，得到了美国资产阶级大部分的有力支持。他用花言巧语骗取了美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少数民族裔的绝大部分以及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幻想。他当选总统以后，一方面大力挽救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同时继续推行反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为了掩盖他对工人阶级的进攻，在国内政治中大搞“身份政治”，激化了种族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在美国工人阶级进一步陷入绝望以后，终于造成了特朗普崛起的政治条件。

本来，在小布什时代，共和党主要是代表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和传统能源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在选举政治中依靠小业主的支持。但是，在民

主党一步步抛弃了美国工人阶级（特别是白人工人阶级）以后，大批白人工人选民转向共和党，逐渐将共和党从一个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改变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在 2016 年大选中，特朗普先是挫败了共和党建制派，在共和党初选中突出重围。在与希拉里·克林顿的对决中，特朗普遭到了美国资产阶级绝大部分的反对，美国资产阶级的主流媒体几乎全体一致对特朗普做负面报道。出乎美国资产阶级的意料之外，特朗普竟然奇迹般地当选了！

特朗普本人是大资本家，特朗普政府在本质上代表的仍然是美国资产阶级一部分的利益。但是，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确实是违背了美国资产阶级主流派的利益和意志，并且曲折地反映了美国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和绝望。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来说，这大概也是美国建国两百多年以来，美国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第一次对选举政治失去了有效控制。因此，特朗普上台，标志着美国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迅速激化，带有历史转折的意义。

怎样看待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及其对全球秩序的影响？特朗普是法西斯主义者吗？如果特朗普连任，美国政治会法西斯化吗？特朗普是国际工人阶级最危险的敌人吗？这些问题，笔者以后再与大家探讨。

特朗普时代和美国的阶级斗争

(2020年9月9日)

第三小提琴

在上一篇短评中(“聊聊美国的阶级斗争和两党政治”),我简单介绍了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美国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与社会妥协体制演变的概况。

当前美国资本主义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与政治危机的根源,在于战后“新政”阶级妥协的瓦解。这种瓦解,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一度被房地产泡沫和借债消费所掩盖,但是到了2008-2009年经济危机以后就暴露无疑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美国资产阶级发生了严重分裂,美国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出现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局面。

以硅谷高科技资本家集团和华尔街金融资本家集团为代表的美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企图继续维持和加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具体来说,就是维持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分工体系,通过与亚洲资产阶级合作继续剥削亚洲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将大部分制造业活动外包给亚洲资本主义,美国资本家专门从事少数高科技领域并攫取相应的超额剩余价值;由此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一部分再分配给金融资本家,另一部分与金融业、科技业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分享。

为了维持上述的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美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要力求维持对世界主要能源供给地区(中东地区)以及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发源地和美国高科技业主要附庸的欧洲的控制,同时避免这些地区受到其他潜在军事强国(俄罗斯)的威胁。因此,美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主张,维持并加强美国在欧洲、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包围、遏制并削弱俄罗斯,以推翻俄罗斯的普京政权作为长远的地缘政治目标。

在美国国内,由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有效劳动力有限(只需要高科技业、金融业的少数高技能劳动力),美国资产阶级主要部分所期望出现的美国资本主义“理想”状态是:将大多数工人阶级驱赶到各种低工资服务业中,将服务业都吸纳不了的底层劳动群众驱赶到失业半失业人群中;向失业半失业群体提供最低水平的福利;逐步减少并放弃在各工人阶级和底层劳动群众社区维持公共安全的努力。其中最后一点,是在近

年美国的阶级斗争中逐渐变得突出起来的。这样做，可以减少资产阶级国家维持统治的成本，同时使得美国工人阶级以及底层劳动群众陷入无休无止的内斗。与此同时，由于新自由主义实际需要的有效劳动力数量有限并且主要依靠攫取来自外部（亚洲）的超额剩余价值，在普通工人阶级和底层劳动群众社区治安的恶化并不会影响新自由主义的资本积累。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实现这样的阴谋，美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和相当程度上代表了美国流氓无产阶级利益的“黑命贵”运动结成了“并不光彩的联盟”（*unholy alliance*）。

美国工人阶级以及与工人阶级相联系的小业主是新自由主义时代受到损害的主要阶级群体。但是，在美国当前的政治条件下，美国工人阶级的利益无法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或者任何有意义的社会改良来得到满足。于是，美国工人阶级的要求只能通过右翼民粹主义的方式曲折地表达出来。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右翼民粹主义虽然与法西斯主义存在着一定联系，但并非简单地就等于法西斯主义。关于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当前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是否必然带来法西斯主义，笔者以后有机会时再阐述。

就目前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来说，其经济政策主张，主要是通过加强贸易保护主义，恢复美国的制造业以及相对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实现经济和能源自给，同时打击和限制移民。其实质，是通过扩大美国资本主义可以有效吸收的生产性劳动力的数量同时限制来自移民劳动力、制造业外包对美国现有劳动力队伍的竞争，来改善美国工人阶级的谈判地位，并恢复某种阶级妥协的条件。

在国际上，右翼民粹主义则继承了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传统，实际上主张承认美国霸权衰落、逐步放弃美国的霸权地位，不再承担在欧洲和中东的军事义务，不阻挠欧洲与俄罗斯改善关系。在右翼民粹主义看来，由于美国可以做到能源自给，在制造业回流后也不再需要依赖亚洲，美国没有必要在海外浪费经济资源以及美国军人的生命。

特朗普是在右翼民粹主义浪潮的推动下当选为美国总统的。但是，在本质上，特朗普并非代表美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也并不完全代表右翼民粹主义，仍然是美国资产阶级一部分（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和传统能源工业）的代表。在其政策实践中，特朗普政府对美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特别是对华尔街金融资本家）做了大量妥协，只是在其第一任的后半期才大大加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力度。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严重破坏了新

自由主义全球分工的秩序，打击了亚洲资本主义的出口制造业，客观上为亚洲人民反对新自由主义体制造成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因此受到了美国高科技业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

以往，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集团虽然相互之间勾心斗角，但是这种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一般来说还是比较“文明”、比较讲规则的。但是，在特朗普时代，美国资产阶级的内部斗争白热化了，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自特朗普上台开始，美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就开始了颠覆特朗普政权的努力。美国资产阶级的主要媒体将抹黑特朗普政权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据分析，在美国主要媒体上对特朗普负面报道的数量是对民主党领袖负面报道数量的 100 多倍。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等“深层国家”伪造并策划了所谓特朗普与俄罗斯勾结干扰 2016 年大选的“俄罗斯门”，致使特朗普政府的前三年纠缠于“俄罗斯门”之中，无法施展内外政策。到了今年初，民主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又以十分滑稽可笑的借口（特朗普在与乌克兰总统的一次通话中请求后者协助调查拜登儿子可能涉及的权钱交易问题）对特朗普提出弹劾。美国高科技资产阶级直接控制的推特、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对于特朗普支持者乃至特朗普本人实行删帖、封号等言论控制。

美国就是在国内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矛盾都严重激化的条件下开始进入 2020 年的。

2020 年初，美国民主党推选总统候选人的初选进入了高潮。在民主党初选中对峙的两个方面，一是以拜登为首的代表美国资产阶级主要部分的民主党“建制派”各候选人，一是以桑德斯、沃伦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左派”候选人。

美国的小资产阶级“左派”主要代表美国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近年来，由于美国资本主义矛盾加深，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和绝对下降，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对于未来悲观和绝望，小资产阶级中下层（特别是青年学生）开始出现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做出重大改造的愿望；其激进部分（如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甚至以马克思主义为标榜。

但是，美国目前并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美国的小资产阶级“左派”也没有真正做好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准备。美国小资产阶级“左派”的政治理想是回到“新政”时代或者在美国建立某种欧洲式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但是，在美国霸权全面衰

落的时代，美国已经无法从全世界剥削到足够的超额剩余价值来恢复“新政”时代的阶级妥协。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小资产阶级“左派”无法与美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建立有效的政治联盟。

美国的工人阶级大多数（特别是白人工人阶级）虽然无法从理论上把握美帝国主义衰落以后所造成的阶级矛盾全面激化，但是他们从长期的政治经验中知道，美国小资产阶级“左派”所主张的各种社会改良（包括全民健康保险、公立大学免费教育等）不仅无法给自己带来好处，而且还会加重自己的经济负担。因为美国资产阶级对民主政治的操纵，各种意在改善最底层地位的经济社会政策不仅不会减少大资本家的财富，反而往往造成针对大多数工人阶级的“再分配”（即加重一般工人阶级家庭的税收负担）。比如，如果政府提高税率，资本家可以逃税，工人却没有办法逃税。此外，小资产阶级“左派”出于政治机会主义而采取的开放移民的主张则直接威胁到了美国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切身利益。

由于美国的小资产阶级“左派”在政治上无法与工人阶级结盟，这就迫使他们寻求其他的政治盟友和群众基础，特别是以失业半失业人口为主的底层社区。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由于美国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生产性劳动力越来越少，非生产性的服务业又无法充分吸收从传统生产部门抛弃出来的劳动力，于是逐步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失业半失业底层群众队伍。这样的失业半失业群体，至少占美国人口的五分之一（按照经济危机期间的失业和就业不足人口粗估），其上限大约可以达到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包括所有的贫困和接近贫困的家庭）。在失业和半失业群体中，黑人、拉丁裔等少数族裔又占了大多数。这样，美国的阶级矛盾又常常以种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

由于美国资本主义无法为其庞大的失业和半失业底层群体提供的正常的生活保障，其中相当一部分必然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沦为流氓无产者。这些流氓无产者，以杀人越货谋生，其主要危害对象，是其他劳动群众。这是美国资本主义造成的悲剧。

随着美国失业半失业底层群体的扩大，在这些底层群体的社区中，逐渐形成了代表这些底层群体利益的政治势力和组织（“黑命贵”就是其中之一）。这样的底层群体代表，也无法与美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建立联盟关系。相反，由于他们所要求的福利（对工人阶级大多数意味着高税收）、扩大移民（对工人阶级大多数意味着更多低工资劳动力的竞争）、减少警察暴力（对工人阶级大多数意味着治安恶化）与美国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利

益直接冲突，反而加深了美国劳动群众两大部分（能够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阶级与失业半失业群体）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又通过小资产阶级“左派”制造并信奉的种族话语而恶性发展。按照这样的话语，美国的黑人等少数群体的悲惨生活在本质上都是由于白人的压迫造成的，所有白人（包括白人工人阶级）天生都是种族主义者，而不是与大多数黑人劳动者同样被资本主义压迫的被剥削者。

在底层运动的实践中，由于底层人民中客观上存在着大量的流氓无产者，底层社区运动实际上不得不与这些流氓无产者达成某种谅解和妥协，即底层社区运动帮助流氓无产者反对“警察暴力”，同时鼓励流氓无产者将他们的危害对象转移到底层社区工作者以外的目标。从过去几个月美国阶级斗争的实际发展来看，像“黑命贵”这样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流氓无产阶级的利益所劫持。关于这个问题，以及怎样看待美国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警察执法和犯罪活动等问题，笔者以后还会继续展开讨论。

在今年年初的民主党初选中，在小资产阶级中下层和一部分底层群众的支持下，以桑德斯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左派”一度看到了初选获胜的希望。面对桑德斯即将胜选的威胁，美国资产阶级派出了他们最孚众望、最有欺骗性的政治家——奥巴马，先是操纵长期被民主党控制的黑人选民帮助拜登赢得了南卡罗莱纳州的初选，然后则公然操纵选举，说服除拜登以外的“建制派”候选人全部退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集中火力打击桑德斯，再利用沃伦这个“左派”内奸分去桑德斯一部分选票，终于使得美国资产阶级中意的僵尸候选人——拜登——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大选的提名。

桑德斯 2016 年和 2020 年两次参加总统竞选失败，集中体现了美国小资产阶级“左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也证明美国的小资产阶级“左派”始终无法摆脱被代表美国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党所利用和玩弄的尴尬处境。

有了“双航母”，中国海军就可以无敌太平洋？

(2020年9月28日)

草庐棋士

随着山东号（002型）航空母舰的服役，中国海军完成了航母从进口到自产的跨越，“双航母”格局的形成使得山东号、辽宁号两舰可以互为备份，提高了航母的出勤效率。与此同时，003型和004型航母也在紧锣密鼓地建造当中。

然而，一些不明就里的网络“军事专家”头脑发热，把航母数量当成了衡量海上军事实力的唯一标准，仿佛有了航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有了航母就可以挥师下台湾、横扫南中国海，有了航母中国海军就可以决战太平洋。今天咱们就扒了航母的皮，给大家泼一盆冷水，让大家看看航母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

一、航母能干什么？

首先，航母是一个移动的机场。在二战至冷战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航母的舰载机一直是舰队防空力量的核心。舰载机能否有效撑起防空圈，保卫己方火力强劲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一直是舰队决战思想的关键。随着舰空导弹和反导技术的发展，不仅大舰巨炮的时代成为历史，航母的防空功能逐渐被导弹驱逐舰取代，舰载机的任务也集中在了对敌方陆海目标的打击上。



停泊在大连港的中国海军山东号航空母舰

其次，航母是航母战斗群的信息中心，可能还是舰队旗舰。受地球曲率的影响，舰上雷达的侦搜范围十分有限，对敌方低空突防的攻击机的反舰导弹往往束手无策。英阿马岛战争中，英国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就是在没有预警机提供侦查的情况下被阿根廷海军战机低空突防击沉的。舰载预警机把雷达搬到了天上，增加了搜索范围，从而增强了整个战斗群在攻防两方面的能力，有可能避免此类惨剧的发生。航母作为舰队中最大的舰艇，也可以安装更加大型的电子设备，支撑更加复杂的参谋作业，为军事和非军事任务的指挥协调提供保障。

二、中、美航母决战太平洋？

据维基百科资料，中国现有的山东号、辽宁号航母分别是排水量 7 万吨和 67500 吨的常规动力航母。此外，中国在建的 003 型常规动力航母（排水量 85000 吨）预计要到 2023 年以后才能开始服役，004 型核动力航母（排水量 11 万吨）预计要到 2025 年以后才能开始服役。

相比之下，中国海军的主要假想敌美国海军现有 11 艘航空母舰，都是排水量 10 万吨以上的核动力航母（包括 10 艘尼米兹级和 1 艘福特级）。美国海军还有 10 艘排水量 5 万吨左右的两栖攻击舰。此外，美国海军现有两

艘排水量 10 万吨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正在建造中，预计将在 2025 年服役；美国海军另外订购了两艘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预计将在 2030 年服役。

可见，无论从航母的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看，中国海军与美国海军相比都有着巨大的差距，这还没有考虑两军在实战经验方面的落差。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海军不具备与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或其他远海进行舰队决战的能力。



在美国西海岸圣地亚哥海面游弋的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

三、尴尬的航母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海军的航母可以设想在台海、南海执行任务，或者担负维护海外交通线的职能。

在台海方向，受两栖登陆的作战形式所限，航母在台湾海峡内难以发挥作用。其一，台湾海峡平均只有 180 公里宽，哪怕是较为落后的强 5 攻击机也有能力覆盖台湾东部所有目标。其二，面向台海的机场的数量、起降能力和损管能力都要显著强于航空母舰，岸基航空兵的效率高于航母、成本低于航母。其三，东南沿海部署有大量战术导弹和远程火箭弹，航母的那点火力就算是“锦上添花”，作用也十分有限。其四，空警 2000 和空警 500 的雷达搜索范围达到 500 公里，也就是说，只要岸基预警机一起飞，哪怕就在大陆上空飘着，也能侦测台海战场情况，根本用不到舰载预警机。

台海风云若起，航母唯一的用处是部署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一方面对东、北两个方向实施反干预警戒，另一方面支援在宜兰、花莲和台东的登陆。如果外军不干预，那么这个行动基本上是多余的，如果外军干预，就意味着航母战斗群要在远离本土 300 公里的地方，在“第一岛链”以外，与拥有充分岸基力量支援的外军海空力量进行舰队决战。孤军深入、后继无援，胜负难料。

在南海问题上，航母的地位同样尴尬。日常情况下，中国与南海诸国的摩擦经济性居多而政治性不强，出动航母进行威胁显然属于牛刀杀鸡，徒增南海诸国的厌恶。在处理经济争端上，专业海警船只的作用要远大于航母。一方面，海警船只成本低、部署灵活、可聚可散，适合处理低烈度的渔业矿业问题。另一方面，海警船只名义上不属于军队作战序列，在政治观感上也有较大的灵活性。如果真的南海生变，需要大量的航空力量进行反干预行动，填海造岛建设的机场和防空体系也完全可以满足需要，不需要另外出动航母。

最后一种可能性，是航母可以为“海外利益”保驾护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各方对“海外利益”的理解也逐渐扩展，现在流行的看法是，海军需要保证从波斯湾出发的海上能源交通线的安全，这也是网络“军事专家”们对航母寄予的最大期望。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要保障这条能源交通线，就需要控制波斯湾、马六甲海峡，以及印度洋上的稳定补给基地。目前实际掌握这条交通线的是美国及其中东盟国、印度和南印度洋诸国的武装力量，换句话说，是这些国家正在监视和控制着中国的海上能源运输线。一旦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且不说和这些国家翻脸，就是假设美国海军不存在，未来的航母战斗群在过了马六甲海峡之后还有多少自主续航能力，能不能和主场作战的印度海空军较量一番，还是个未知数。

四、航母的政治经济学

航母作为一种武器装备，是国家武装力量体系的一部分；武装力量是为了实现特定的内部和外部目标而构建的政治工具；而究竟追求什么样的内外目标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简单地说，航空母舰是给那些在全球拥有稳固殖民地、附庸国和军事基地的世界帝国量身打造的装备。这样的世界帝国可以借助附庸把前线压缩到距离敌国领土数百公里的海域，航母的作用就是弥补近海进攻作战中岸基航空兵和海面侦测手段的不足，这是航母唯一“正确”的用法。航母不是一种防御兵器，尤其不是给那些敌人就在海岸线几百公里外的国家准备的防御兵器。在对手的海空军实力占优，且不存在“偷袭珍珠港”的可能性的时候，过度扩编航母舰队，是一种战略目标不明且非常不经济的行为。

当然，拥有航母是树立民族自尊心的重要工程，这一点印度和泰国方面也很清楚。不过，如果在航母上投了大价钱，到了真正动武的时候它们却成了“大和号”、“武藏号”一样损失不起的“民族骄傲”，那就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日本海军大和号战列舰，排水量 73000 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军舰，1945 年 4 月 7 日在日本九州鹿儿岛西南海域被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轰炸机群击沉（图为大和号战列舰 1941 年 12 月在宿毛湾测试航速）

美国大选发生严重舞弊，美国面临空前政治危机 (2020年11月4日)

远航一号

2020年11月3日，美国进行了大选。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民在当天参加了投票。此前，约有一亿美国人民已经分别以邮寄选票或在投票站现场投票的方式提前投票。这次大选将选举总统、改选参议院三分之一的席位和众议院的全部席位。

美国这次大选，是在美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世界资本主义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条件下进行的。美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各阶级内部的主要集团都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了鲜明的政治立场。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代表的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攫取了巨大超额利润的硅谷高科技资本家和华尔街金融资本家的利益，并且得到了在全球化中受益的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国际上，拜登集团得到了欧洲与亚洲资产阶级公开或暗中的支持。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代表的是传统能源、传统制造业以及与美国本土经济联系较为密切的中小资本家的利益。特朗普反对自由贸易和开放移民。在当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朗普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对于缓解美国工人阶级的困境有一定帮助。特朗普的亚洲政策在客观上严重破坏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分工，为亚洲工人阶级的斗争造成了有利的条件。美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绝大多数对特朗普采取拥护的态度。这是美国工人从他们的阶级本能出发，在目前条件下反对大资产阶级的务实做法。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小资产阶级“左派”、伪托派、伪毛派和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在此次美国大选中采取了不光彩的机会主义的立场，为代表反动的新自由主义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拜登集团摇旗呐喊。美国“左派”的滑稽可笑的表演，将自己推到了美国和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对立面，在资产阶级面前也卖不出好价钱。

11月3日晚，大选进程一波三折。至美国东部时间当晚11时左右，特朗普已经赢下关键的佛罗里达州，并且在威斯康星、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北卡罗莱纳、佐治亚等州等取得了明显领先的优势。

这时，在亚利桑那州刚刚开出大约70%票数的时候，主流媒体就急急忙忙宣布拜登已经赢下亚利桑那州。过了午夜，美国总统选举仍然悬而未决。但特朗普保持着在上述各州的领先优势。如果这种领先形势保持下去，特朗普最终将赢得293张选举人票，拜登只能得到245张选举人票，特朗普将赢得大选并连任总统。

但是，就在绝大多数美国人民都进入梦乡的时候，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当地时间凌晨4点30分，威斯康星州开出了94%的票，特朗普仍然领先约11万张票（领先幅度约3%）。仅仅15分钟后，号称开出了95%的票，给拜登的选票竟然多出了14万张票（相当于威斯康星选票总数的4%以上！），拜登在威斯康星实现反超！

午夜过后时，密歇根开出了约60%的票，特朗普以54%对拜登的44%大幅度领先约10个百分点。过了一个晚上，到当地时间早上5点钟左右，密歇根州开出了90%的票，特朗普仅以0.4%的幅度（约14000张票）微弱领先。如果民主党继续操作，密歇根很可能在未来几个小时改为拜登领先。威斯康星、密歇根两州翻盘后，将导致特朗普以微弱差距落选。尽管这次大选的进程表明，特

朗普实际上得到了美国“铁锈带”各州绝大部分工人阶级的支持。

如此大规模的选举舞弊行为，是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是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矛盾严重激化的反映，也是控制美国国家机器、媒体并且与流氓无产者的法西斯式冲锋队相勾结的美国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新自由主义派别向美国劳动人民发起的一次大规模反扑。

目前，美国政局不稳，正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美国资产阶级中的新自由主义派在政治上控制着大部分国家机器，可以完全操纵媒体和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在基层则可以依靠安提法（美国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恐怖主义团体）和来自于流氓无产者的“黑命贵”实施暴力恐怖，因而处于优势地位。特朗普集团所代表的美国中小资本家处于劣势。特朗普集团要反败为胜，唯一的希望，是全面发动美国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以群众斗争迫使大资产阶级让步。但是，这与特朗普集团的阶级本性是不相符的。

拜登集团得逞后，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将全面衰落，美国劳动人民将面临一个长期的黑暗时期，世界人民反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也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局面。但是，无论国际资产阶级多么狡猾凶残，世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他们无法克服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危机必将进一步加深。领导全世界人民反抗资本主义的重任将从此落在亚洲无产阶级的肩上。

民主党在威斯康星州选举舞弊的铁证

(2020 年 11 月 6 日)

远航一号

据了解，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给共和党众议员候选人投票的总数是 162 万票；特朗普得到 161 万票。

给民主党众议员候选人投票的总数是 153 万票；拜登得到 163 万票。

对于不了解美国选举的网友介绍一下：在美国大选中，总统候选人和众议院候选人的名单是在一张选票上。所以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投票的人几乎百分之百会同时给共和党的众议员候选人投票，而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投票的人几乎百分之百会同时给民主党的众议员候选人投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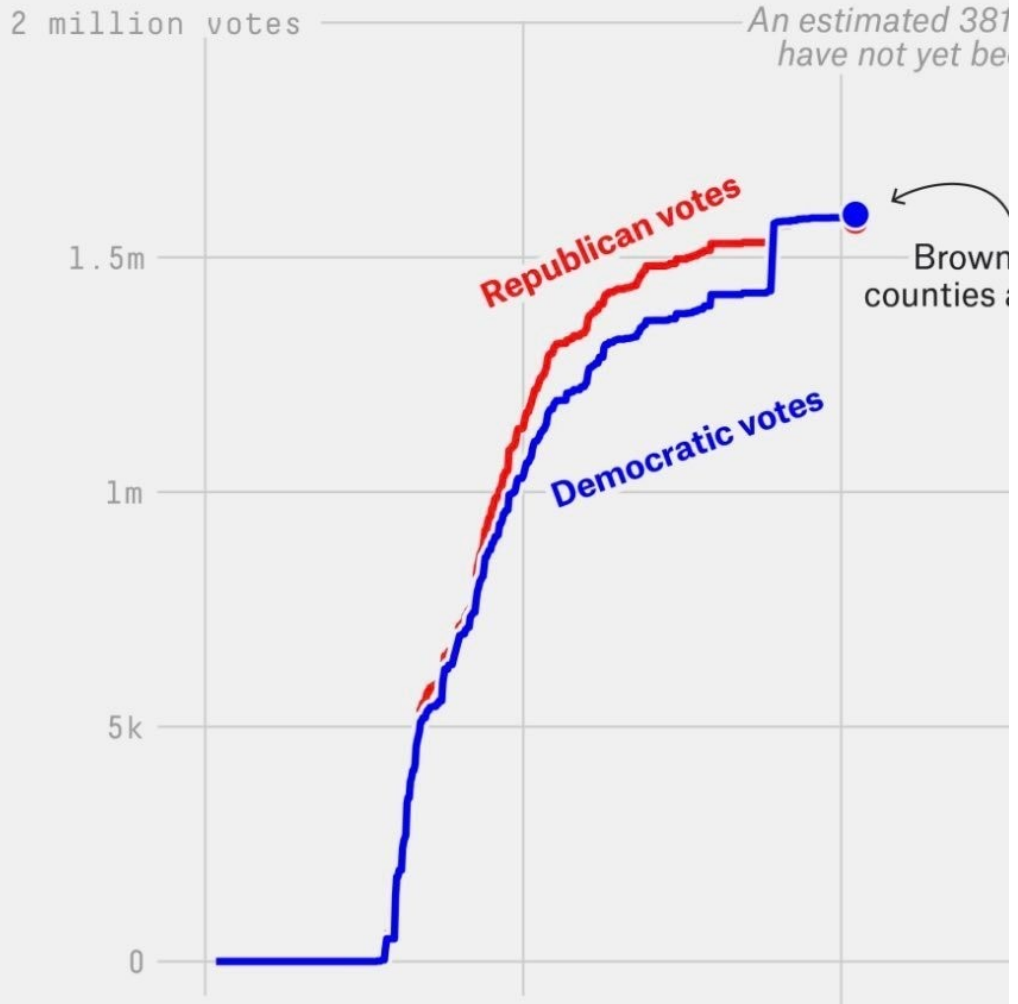
无论如何，由于美国几乎没有第三党候选人竞选众议员，两党众议员候选人的总得票数应当大致等于两个总统候选人的总得票数。

所以，拜登相对于民主党众议员候选人多出来的 10 万票几乎肯定是来自于选举舞弊，而且这个多出来的票数使得拜登刚好可以超过特朗普。

拜登集团的选举舞弊，还可以从下面这张图得到佐证。图中的蓝线代表 3 日晚至 4 日凌晨拜登在威斯康星州得票变化的情况。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凌晨四点半左右，拜登得票突然跃升，突然得到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十几万票。

The state of the race in Wisconsin

Total presidential votes for each party so far, with 89 percent of Wisconsin's expected vote counted as of 6:23 a.m. on Nov 3, 2020. An estimated 381,000 votes have not yet been counted.



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 特朗普，“弱智老白肥丑男”们的英雄

(2020年11月9日)

静流

昨日之静流，明日之惊涛

就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电视里传来了拜登宣称胜选的消息。特朗普这出四年的“总统”戏怕是要唱到头了。不过，上面唱戏的不甘心，下面听戏的也不消停。在中文媒体上，许多自称“女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多元文化支持者”的公众号开始幸灾乐祸，仿佛终于要把这帮“红脖”、“屌丝”、“脑残粉”赶回大农村，回归某种“正常状态”了。另一方面，许多支持特朗普的美国民众自发在选举时开着自家的车插着小旗为特朗普拉票，在选举夜为特朗普祈祷，在舞弊丑闻爆发时聚集在唱票点门口“上访”，展现出远超出拜登支持者的政治热情。美国、中国和全世界的民意为什么会如此分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群众支持一个看起来不靠谱的总统？美国的“身份政治”群体和某些“左派”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篇文章就带大家仔细分析这些问题。

一、看！那有个“弱智老白肥丑男”！



这是一副典型的讽刺特朗普支持者的漫画，类似的漫画正在每时每刻由专业团队用流水线的方式生产着。尽管主题不同，这些漫画的主角总有那么几个共同点：他们多为白人男性，身处“深红”州县，通常体重超标，长相有碍观瞻，年届不惑之数，衣着滑稽可笑。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智商堪忧、反智之极、笃信宗教、还没本科学历。这些漫画反映的是针对美国无产阶级的刻板印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以来，传统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美国工人已经经历了四十年的苦难。工会瓦解、工资停滞、社区分裂、家庭解体、毒品泛滥、黑帮横行，甚至连预期寿命这种反应绝对生活水准的指标都在下降。不过，在资本主义文化精英的眼中，工人们或穷或死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但只要他们敢支持特朗普，他们的贫穷就会被画成是懒惰、他们的煎熬就会被说成是愚蠢、他们无暇打理的仪容就会被扭曲成不懂“身材管理”的艺术、他们为了维护本以支离破碎的社区和尊严的一点点努力都会被污蔑成是“反科学”的“无能狂怒”、而只要他们敢对家庭问题发表意见，那一定就是“男性霸权”的末日迷狂。

类似的剧本大家似乎在哪里听过。对，就在地球的另一端，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曾有着虽然紧巴但还说得过去的日子，曾有着还算安稳工作的保证，曾有着作为着一名普通劳动者的荣耀。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他们也逐渐地失去了一切，也被媒体描述成“懒汉”，活该失去可耻的“铁饭碗”。而在今天，当他们的后代也走向了工作场所开始享受新自由主义的“福报”时，他们也发现，只要无法满足日益刁钻的消费主义的要求，他们就会被说成是没有魅力的“油腻大叔”，是不懂情调的“钢铁直男”。他们整天听到的都是“年纪越大，越没人能忍受你的穷”，“东方的男人配不上东方的女人”等等。

跨越一万公里，环球同此凉热。

二、东方和西方的“左与右”

就是这些有着类似经历，处在类似境地的两种人，在各自社会里，却被贴上了截然相反的政治标签。在美国，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川粉”通常被认为是属于右派。而中国的老工人被称为“毛左”，新工人和学生中政治上趋于进步的部分，则收获了“极左”的称号。站在美国工人对立面的硅谷和华尔街的资本集团以及攀附他们的金融、技术和文化“精英”，以及其政治代表民主党，则被称为左派。而在东方，以出口加工制造业为核心的资本、在全球化中受益的小资、以及其文化代表“公知”则成了东方话语中的右派。

东方和西方的“左与右”是颠倒的。

东方的左右之分是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经历一百多年血与火斗争的东方人民，只会把“右派”的雅号赠给压迫者和卖国贼。美国的左右之分也有其历史渊源。在罗斯福新政及其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民主党为代表的美国资产阶级主体实行积极的国家干预政策，推广劳资妥协，建立福利国家，得到了包括美国工人在内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拥护，故而被当成是左派。但是，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日益高涨的工人斗争、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逐渐突破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底线，民主党在配合共和党里根政府执行铁腕镇压的同时，自己也抛弃了美国工人阶级。进入二十一世纪，民主党的阶级基础逐渐演变为硅谷的高科技资本集团和华尔街的金融资本集团，其社会民意基础则主要包括依附于上述两个集团的专业技术人员（小资）、少数族裔和非法移民。美国工人阶级，尤其是“东北老工业区”的工人阶级逐渐转向支持共和党。

笼统地讲，整个民主党都被美国的主流政治话语囊括进“左派”的范畴。但是美国的“左派”却是个头重脚轻的三层蛋糕。第一层，也是最大的一层是民主党的主流，也叫建制派，其代表人物有拜登、克林顿、奥巴马等。他们直接代表上述两大资本集团的利益，坚定地执行金主们要求的全球化政策：对外扩大侵略扩张、煽动“颜色革命”，屠杀无辜民众；对内压制蓝领工人，扩大非法移民，扶持黑帮和身份政治团体、推动毒品合法化。他们掌控政府、军队、媒体和以“安提法（Antifa）”为代表的黑社会组织。这群帝国主义者是全球反动秩序的台柱，被称为“左派”纯属历史的误会，我们可以叫他们“白左”（以普世价值、身份政治等“左文化”为掩护对世界人民实施新自由主义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公开地打白旗、反红旗）。第二层是近年来兴起的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派别，代表人物有桑德斯、沃伦、科尔特斯等，代表组织是美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是专业的政治投机商，他们利用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民众对资本主义的普遍不满来捞取政治资本，用社会主义主义的口号和某些进步政策来吸引支持者。在2016年和2020年的民主党初选中，桑德斯两次“识大体”地让出了候选人的位置给克林顿和拜登，让全世界的改良派两次丢丑。不过，他们在形式上鼓吹一些比“白左”更进步的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在劳动人民面前表现出更大的虚伪性、欺骗性。我们可以叫他们“伪左”。第三层，也是最小最弱的一层，是美国高等教育系统里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为了方便，我们称他们为“学左”。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有着光荣的历史，他们曾在麦卡锡主义的白色恐怖下坚持为劳动人民工作，他们曾经遍访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美国人民描绘未来社会，维护美国劳动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友谊，他们也是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和“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但是在特朗普当政的四年里，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继承者们多数没有认清特朗普当选的阶级背景，反而跟在“白左”和“伪左”集团后面，满足于指责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是“法西斯”。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自我安慰式地认为，只要能让特朗普这个“工人阶级最危险的敌人”下台，支持拜登只是一种“必要之恶”。

一方面，美国“左派”自身的复杂结构让很多东方的进步人士摸不着头脑，再加上东方的商业媒体对美国媒体鹦鹉学舌式的转播，很多富有正义感的东方人认为，那些“弱智老白肥丑男”是特朗普的法西斯“党卫军”，而那些满口“社会主义”词藻、长得又十分“政治正确”的“伪左”政客是天然盟友。在地理隔绝和信息污染的反复扭曲下，仿佛

拜登这样的帝国主义分子，也显得不那么可憎了。另一方面，美国社民党“伪左”的反复叛卖以及他们毫无原则的攻击和污蔑“川粉”的行为已经激起了民众的普遍反感。再加上他们对资产阶级审查、冻结“川粉”社交媒体账号的行为默不作声，他们已经彻底失去了美国工人的支持。在许多美国工人眼里，**民主党=伪左=社会主义=剥夺自由=东方大国**。

两方面的误会加起来，使得大洋两岸的劳动人民陷入了彼此敌视的状态：“法西斯”成了随意扣出去的帽子，而“社会主义”的名号也已经被彻底玩坏了。

美国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深厚的革命传统，但这不代表美国人民，尤其是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工人阶级没有基本的正义感。宗教是美国工人阶级生活的重要部分。宗教是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它可以麻痹劳动人民几千年，但却从未彻底摧毁过劳动人民对正义的向往。美国劳动人民信仰上帝，就和东方的劳动人民怀念毛泽东一样。美国劳动人民呼喊“上帝保佑美国”，在东方的劳动人民那里，就只能被翻译成“东方红，太阳升”。上帝和毛泽东，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那里有着不一样的解读，但在今天东西方劳动人民的眼里他们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今日苦难生活的精神支柱，也是明日克服苦难的战斗号角。

那么，这一切和特朗普又有什么关系呢？

三、人格无所谓，政策是灵魂

美国资产阶级的主流民调对总统选举的预测出奇地不准，早已成为了国际笑话。不过，民调乃至街头采访里面一些问题，更给我们一些有意思的信息。一个被反复问到的问题是“你为何支持该候选人？”。拜登的支持者大多选择的是不喜欢特朗普这个人，而特朗普支持者的回答则截然不同：政策。

就国内经济政策而言，特朗普要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要设置高关税维护国内市场，要限制非法移民入境，一句话，他要维持美国工人阶级对本国劳动力市场的垄断，保住美国工人阶级的饭碗。尽管在防控新冠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失误，但和欧美其他国家比起来也算半斤八两。就外交政策而言，特朗普从未发动过侵略战争，从未试图挑起别国内战或颠覆别国政权（甚至断了“公知”的粮），也没有扩大过现有战争的规模。相反，他一直执行的是撤军和收缩的战略：从叙利亚撤军，从伊拉克撤军，从阿富汗撤军，与俄罗斯和朝

鲜缓和关系。一句话，特朗普从没有主动让披着军装的美国工人飞跃万里去大规模屠杀别国人民，相对干净的特朗普远比双手沾满鲜血的奥巴马更值得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就文化和社会政策而言，特朗普试图遏制愈演愈烈的身份政治对普通民众的迫害（下一部分讲这个问题），试图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找回统一的民族精神，试图重建被资产阶级雇佣的流氓无产者破坏的社会秩序，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用一句话对特朗普的政策导向进行总结的话，那就是：**他试图把一个侵略成性、内部分裂的世界帝国重塑为一个自力更生、团结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一切得到了以工人阶级为主，小业主为辅的美国劳动人民的拥护，甚至在有色人种中也赢得了史无前例的高支持度。

尽管特朗普口无遮拦、毫无风雅、屡次破产、性格乖张，但是这些都与政策毫无关联。只要不是有通敌卖国、贪污腐化、杀人越货、嫖宿幼女之类伤天害理的事情，美国工人从来不会在意这些“小节”。相反，以《纽约时报》为首的美国资产阶级主流媒体，以及陶醉于这些文字垃圾来获得优越感的小资却对此穷追不舍。他们把特朗普本人塑造为一个道德败坏的弱智小孩，遇到点事情就无理哭闹。而“川粉”，除了是“弱智老白肥丑男”之外，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失败者（loser）。总之在主流媒体中，美国（乃至北美）被划分为两个世界，反对特朗普的地区被叫做“知书明理之邦”（下图蓝色地区），支持特朗普的地区被称为“蠢货操蛋斯坦”（下图红色地区）。



尽管主流媒体把这些人都当成傻瓜，却丝毫没有阻挡特朗普的支持者日益高涨的政治热情。在此次美国总统选举之前，特朗普的竞选集会人山人海，拜登的竞选集会门可罗雀；特朗普的支持者开着自己的小卡车插上小旗自费进行宣传，而拜登的支持者除了在自己门口插几块竞选团队免费送的塑料牌牌之外什么都懒得做。甚至拜登在发表胜选感言的时候，还要把许多汽车开到现场：人太少了，填不住场子。

在主流媒体和文化精英看来，特朗普的支持者背叛了自己的利益，在自掘坟墓。甚至有些自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把特朗普称为“工人阶级最危险的敌人”。实话实说，特朗普反工人吗？当然反，不反就不是美国总统了。但是，特朗普“反工人”的程度却是

四十年来最低的，否则没有任何人能解释这个“工人阶级最危险的敌人”为何在四年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工人支持。

究竟是美国的工人阶级自发堕落，拒绝“理性”的感召？还是美国的文化精英在嘲讽羞辱中彻底脱离了群众？这一切都和身份政治脱不了干系。

四、身份政治的过去与未来

任何政治理论和政治行动都会基于一个特定的出发点。当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出发点有四个。自由主义者的政治是公民政治：人生而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之权利，人人平等，缔结社会契约造就国家，个人理性垒筑为集体理性；保守主义者的政治是社群政治：人的理性存在缺陷，故而需要结成家庭、社群、国家来自我保护。传统智慧是宝贵财富，政治制度是复杂图景，任何社会变革皆应审慎而行，切勿操之过急；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是阶级政治：一切历史皆为阶级斗争史，自在阶级觉醒为自为阶级，社会革命冲破上层建筑、重塑生产关系，人类社会的曲折前进中迎来光明未来。这些政治思想在十八十九世纪都已成型，而身份政治则是二战之后的产物。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的社会民主运动，东方的共产主义运动、“南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转入低潮。一些西方的进步分子对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失去信心，但又不愿完全放弃左翼话语，这就催生了以个体叙事代替宏大叙事，以个人体验代替历史潮流，以种族、性别、文化等“身份”划分来代替阶级斗争的逃避现实的趋势。原本统一的进步斗争，在这种失败主义的腐蚀下逐渐堕落为一个所谓的“彩虹同盟”。这个“彩虹同盟”主要包括只反男性不反资本的“激进女权思想”、只反“白人特权”不反阶级压迫的“批判种族理论”、夸大“认同差异”排斥团结共进的“多元文化主义”。与公民、社群和阶级等统一的政治思想不同，身份政治的核心是求异而非存同，是对自己个体情感体验和心路历程的个性化叙事。作为一种抗争运动，身份政治从来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任何意义上的组织力，因为任何统一的组织和行动都是要求牺牲，而牺牲则意味着冲破自我感动的“身份”枷锁，否定小我而成就大我。

表面上看，身份政治是追求种族、性别和文化间的平等。其实不然，在身份政治看来，黑人和白人，男人和女人，东方人和西方人的个体体验不同，故而永远不可能建立同

呼吸共命运的同志情谊，他们之间有的只是过去的劫难和今天的救赎。任何有身份“特权”的人（男性、白人、西方人），哪怕是个普通工人，都需要向没有“特权”的人赎罪，反省自己的“与生俱来”的种族主义罪孽（whiteness）。“身份”之间的赎罪关系相互交错叠加，构筑了一个永远无法打破的等级秩序。在身份政治甚嚣尘上之地，如果一个人同时具有黑人、女性、同性恋、变性人、穆斯林、难民等身份，那TA（还不能随便说“她”）就处在身份政治台阶的顶端。而一个白人（亚洲人）、男性、异性恋则需要时时反思自己有没有种族和性别歧视，如果没有，也需要时时为自己祖上的种族歧视痛悔。

在一般劳动群众眼里，这种自我感动的象牙塔哲学纯属胡闹，但是资产阶级却绝不会放弃利用身份政治来压迫群众的任何机会。首先，他们大规模降低标准录取某些族裔的学生，但却完全不去帮助这些学生能否跟得上课程；第二，在就业市场搞特殊照顾，变相压制其他族裔的就业机会；第三，在政府机关和一些公立机构强行开展“反种族主义”教育，胁迫白人群众去自我仇恨；第四，压制传统性取向；第五，鼓吹以吸毒、滥交为核心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第六，鼓吹要纠正什么微观侵犯（microaggression），让人民群众自我审查日常言论，去发现和纠正不自觉的歧视性言论，搞得人人自危，徒增种族隔阂；第七，在今年夏季的骚乱中，身份政治还加上削减警察部门预算的内容，理由是警察都是种族主义的走狗。

身份政治号称自己的重要使命是消除“刻板印象”，消除各种“系统性歧视”。但可笑的是，身份政治的带头精英们却和资产阶级沆瀣一气，搞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恶名昭彰的“刻板印象”工程：对“川粉”（大部分为工人）的系统性歧视。在这种歧视下，那些身份政治的“受益”群体，即黑人、拉丁裔和女性群众也深受其苦。他们的“身份”要求他们反对特朗普，如果胆敢不反对或反对不积极，就会被身份政治的小将们“开除黑籍”，“开除墨籍”。“女籍”恐怕不大好开，那就指责她们甘为男性玩物，自己“物化”自己好了。

美国的工人群众被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和文化精英变着法儿地污蔑了两个世纪了，为什么唯独“身份政治”会引发如此大的反感？这是因为身份政治不仅在羞辱着群众的朴实情感，它还在侵犯着群众的现实利益。在认识到推翻资本主义的最终使命之前，工人阶级的斗争集中在经济环节，即维持劳动力再生产。首先，工人需要个工作才能完成养家

糊口。占美国劳动人口六成的白人工人中的多数从来没有欺负过其他族裔，但是却要在公共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上被区别对待，他们中的多数从来没有主观上要剥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但是他们的工作还是被产业转移一点一点的消灭，被各路便宜的外来劳工挤占。身份政治把工人的一切质疑和牢骚都贴上了“种族主义”的标签大张挞伐。第二，工人需要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来完成代际再生产。这一方面是为了子女工作和生活稳定，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提供一个社会安全网络，为自己的老年生活留个照应。然而，白人和亚裔学生入学受到变相歧视，所谓“亚裔细分”法案更会进一步压制本来已经备受挤压的东亚学生。对传统性取向（同性恋）的压制会破坏家庭环境，制造代际冲突。而染上毒瘾则会直接击碎工人阶级家庭的小康梦想。上层小资家庭孩子吸点毒出来还是上层小资，某人的宝贝儿子吸毒甚至被捧成是“与毒瘾作战的英雄”，而工人阶级孩子显然玩不起这么个刺激的游戏。第三，工人阶级需要一个稳定安全的社会秩序。流氓无产者天天打砸抢烧还不受法律制裁的环境是任何一个勤劳正直的劳动者所无法容忍的。削减警察开支，就等同于交由黑帮治国。如果工人阶级不反对这些，那才是真正的“弱智”。

这样，矛盾就很清晰了。一方面，鼓吹身份政治的文化精英认为“川粉”是一群冥顽不灵的反智人渣，依附于跨国资本的小资也不屑于与“川粉”为伍。更其甚者，一些中国“川黑”宣称拜登的胜选是“正常”战胜“不正常”，“文明”战胜“野蛮”，“常识”战胜“阴谋论”等光辉胜利。另一方面，那些在经济上受剥削，在文化上受压制，在感情上被欺凌的美国劳动群众，那些在冰天雪地里排了一天的队却发现自己的选票被篡改扯碎被烧毁的工人、农民、小业主会怎么想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些鼓吹身份政治的团团伙伙，夺我工作、毁我家庭、篡我民主、坏我法制、裂我国家、毒我子孙，我们不是法西斯，他们才是法西斯！而那些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可耻地摇着“社会主义”旗帜的社民党和“左派”，也会被工人阶级一并当作是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

美国的身份政治，将在劳动人民愤怒的目光中，迎来一个更不确定、愈发黯淡的2021年。

五、结语

“弱智老白肥丑男”们终究被打败了。特朗普嘴上强硬，说要在最高法院把官司打到底，但是他恐怕很清楚，走法律程序的结果是早已注定的。他现在可能正在和对方积极商榷如何争取个体面的谢幕。他在五年前抱着玩玩看的心态参加竞选的时候，恐怕根本不会想到，他的这场四年的“脱口秀”竟然把美国各族人民郁积了这么久的阶级情感和民族情感都呼唤了出来。就在本文写作时，高举着“特朗普 2020”和“黑命攸关（BLM）”旗帜的群众竟然放下隔阂汇流到了一起，高喊着“USA”的口号去呼唤正义降临。正义总会降临，长征才刚刚开始。



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特朗普的人生算是没有遗憾了。但发人深省的是，美国主流政治精英的合法性居然跌落到了这种地步，特朗普这种半瓶子醋都能称为英雄。但更加有意思的是，现在在中文媒体上弹冠相庆的“亚洲新女性”和“硅谷精英”们似乎并没有察觉几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并不理解四年前自己怎么就输了，他们还是不理解今天怎么就赢了，他们从来不知晓人应当为何而生活，最后也会在蒙昧和自负中迎来不可避免的灭亡。

晚期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世界阶级斗争

（2020年11月18日）

远航一号

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发端于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到现在已经大约四十年了。新自由主义时代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撒切尔在英国上台、里根在美国上台，而1973年智利的皮诺切特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1976年中国的反革命政变则是前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世界范围革命力量的高涨，世界资产阶级不得不对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做出重大让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福利国家和自由民主体制在内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阶级妥协；社会主义阵营扩大到了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世界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二。

但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积累陷入了新的困境，世界革命运动也出现了新高潮。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摇摇欲坠的局面，国际资产阶级与正在形成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发起了大反扑。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国际资产阶级通过在政治上的反攻倒算，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曾经取得的一部分革命和改良成果，从而重新恢复世界范围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仍然是世界资本主义财富积聚的中心。但是，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再是物质生产和生产性资本积累的主要场所。中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最大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地和制造业生产中心。通过剥削中国的广大廉价劳动力，以美国为首的跨国资产阶级攫取了巨量的超额利润，中国资产阶级也得以分享利益。到本世纪初，（除日本以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都恢复到了接近或超过战后最高的水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相对繁荣。

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繁荣的过程中，已经造成了新的社会力量和新的斗争条件。随着这些新的社会力量的兴起，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正在一步步地走向瓦解；其最终的结果，将不仅是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灭亡，而且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灭亡。

世界阶级斗争的主战场

美国和中国，是当前世界范围阶级斗争的主战场。

在美国和欧洲，在战后阶级妥协瓦解后，这些地方的工人阶级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其原有的“世界工人贵族”的地位。美、欧工人阶级为了维持原有的较高工资和福利的斗争发展为各式各样的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群众运动。其中，在美国，绝大部分工人阶级逐步地集结在特朗普所领导的民粹主义群众运动中。这将是未来相当一个时期美国阶级斗争的主要特点。

在中国，长时期的快速资本主义积累已经在中国造成了一支日渐壮大的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队伍。但是，由于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半外围的地位，中国的资产阶级既没有条件更没有意愿来满足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这个基本矛盾决定了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必然在不久的将来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并导致新的政治局面。

在美国于本世纪初在中东地区的战争冒险失败以后，美帝国主义不得不在世界范围内实行战略收缩。这样，从东欧、中亚，到中东、非洲和印度洋周边的广大地区，都不再有一个强有力的帝国主义国家来维持这些地区的政治稳定以及资本积累的安全。这些地区正在陷入长期的动荡和冲突。由于这些地区同时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特别是中国资本主义）主要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地，这样的动荡和冲突发展下去，将对世界资本主义（特别是中国资本主义）构成严重的威胁。

美国的阶级斗争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初期，美国的跨国资产阶级通过将工业资本转移到中国等廉价劳动力地区、同时在国内积极打击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使得美国资本家的总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高的水平，美国经济的利润率也恢复到了接近战后最高的水平。与此同时，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陷入长期停滞，出现了相对和绝对的贫困化。

尽管如此，在 2008 年以前，在房地产泡沫的刺激下，美国资产阶级鼓励工人阶级家庭借债消费，工人阶级的物质消费水平仍然在增长，美国工人在某种程度上分享到了来自中国的廉价消费品的好处。

2008-2009 年的经济危机是到那时为止的战后最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美国普通劳动者的借债消费大幅度萎缩。工人阶级家庭不仅实际收入停滞和下降，而且无法维持原有的消费水平。在奥巴马执政的八年期间，资本家的利润率很快就恢复并且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而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困境日益加深。在这种形势下，特朗普所领导的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群众运动异军突起。

在 2016 年大选时，特朗普已经遭到了美国资产阶级主要力量的反对。但是，应当说，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对于特朗普所代表的力量仍然不重视，认为只要靠常规的手段、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正常范围内就可以将他们所中意的希拉里·克林顿推上总统宝座。

出乎美国资产阶级的意料之外，特朗普奇迹般地当选了。从那时起，美国资产阶级颠覆特朗普政府的努力就一直没有停歇。尽管特朗普仅仅是在其执政后期采取了有限的破坏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行动（主要是通过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动所谓“贸易战”），这已经超出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容忍限度。

在 2020 年大选前，美国资产阶级几乎是全体一致地动员其所掌握的媒体舆论对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展开造谣攻击，美国高科技垄断资本直接控制的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更是破天荒地直接采用以往只有专制国家才采用的言论审查手段。当所有这些手段都不足以阻止特朗普连任时，美国资产阶级又与各大城市的黑帮直接勾结，在若干个关键的州实施大规模的选举舞弊、篡改选举结果，终于在对特朗普的政治斗争中占了上风。

2020 年的大选舞弊在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上是一起十分严重的事件。应当说，在此之前，无论美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如何尖锐，一般来说，资产阶级在形式上还是愿意遵守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则的，用“费厄泼赖”的方式开展政治斗争。2020 年的大选舞弊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从此以后，美国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体制将蜕变为一般在半外国国家才有的“寡头民主”体制。也就是说，在形式上仍然有少量政治自由以及选举等政治形式，但是资产阶级国家不仅在实质上由资产阶级控制，而且就其内容来说，不再是大小资本家共同的“管理委员会”，而是沦落为少数财阀的工具。这样的少数财阀的统治，

不仅通过资产阶级民主的常规手段，而且会大量采用上不得台面的舞弊、权钱交易、黑帮暴力威胁等以往在“第三世界”才会见到的下流手法。可笑的是，浑浑噩噩的美国小资产阶级“左派”正在亲手帮助美国的大资产阶级摧毁在美国已经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自由民主体制。

拜登集团窃取了美国总统的宝座以后，就其主观愿望来说，将按照美国大资产阶级的意志努力恢复美国和世界新自由主义的“正常秩序”。具体来说，就是尽快修复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友好关系”，巩固并扩大现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分工，保障美国大资产阶级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帮助下继续攫取世界垄断利润的大部分。另一方面，进一步开放移民，同时促进非法移民合法化，用大量的新的廉价劳动力来充斥国内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打击美国的工人阶级。

但是，与克林顿、奥巴马时代相比，美国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仅就美国国内来说，尽管特朗普遭到美国资产阶级的暗算，美国工人阶级反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斗争并没有停止。特朗普下台后，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有可能发展为新的群众运动，在资产阶级的常规政治舞台以外对美国资产阶级造成牵制，一定程度上限制拜登政府的行动自由。

美国的小资产阶级“左派”在充当了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不光彩历史角色之后，现在正在幻想拜登政府将在他们的“压力”之下实行所谓“历史上最进步”的政策。拜登集团在竞选期间开了很多空头支票。但是，大选结果，共和党仍然占参议院多数，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多数比原来缩小了，民主党中的所谓“进步派”议员在民主党内部也是少数派。这样，拜登入主白宫以后，完全可以以各种进步政策在国会无法通过为借口来搪塞小资产阶级“左派”，然后将各种“进步”许诺束之高阁。

即使拜登政府为了笼络小资产阶级“左派”，想要搞一些象征性的再分配政策来装样子，大资产阶级也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偷税避税或转嫁税收负担。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底层的福利没有增加多少，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的税负反而显著增加。

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为了应付国内外各种矛盾，拜登政府可能在上台之初，实行某种“左翼”凯恩斯主义政策，不惜大幅度地扩大财政赤字来实现短期的经济“繁荣”。如

果发生这种情况，由于美国的物质生产部门已经大量转移到世界其他地方，美国的大规模财政赤字会直接转化为大规模的贸易赤字。

美国的大规模贸易赤字要得以维持，就需要世界其他地方（主要是中国）提供大量的贸易顺差。所以，如果拜登政府实行大规模财政赤字的政策，在短期内，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将得到好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将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到 2008 年以前的状况。那时是中国（用血汗工厂剥削来）生产，美国（工人靠借债）消费；未来几年则可能是中国（用“996”剥削来）生产，美国（政府靠赤字）花钱。

如果拜登政府采取这样一种策略，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各种深刻矛盾可能暂时被掩盖。这样的格局将一直持续到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矛盾激化从而中国无法再向世界资本主义提供大量贸易顺差的时候为止。

中国的阶级斗争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世纪，经过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国完成了从社会主义积累体制向一般的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过渡。中国的政治变化在世界阶级斗争中也起了关键的作用。由于中国向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提供了数量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对于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确立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分工，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本世纪初，国营企业的老工人在经过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以后，痛定思痛，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其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列毛主义的影响，并领导了可歌可泣的反私有化斗争。老工人的反私有化斗争给中国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并有力地配合了本世纪初马列毛左派的崛起。但是，在 2009 年通钢工人的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以后，随着私有化基本完成，老工人逐步退出了阶级斗争的第一线。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制造业出口中心。伴随着资本主义制造业的发展，中国新一代无产阶级也成长起来。中国出口制造业的工人集中在沿海诸省，深受血汗工厂的剥削，其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与二十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各国的产业工人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些工人在劳动场所和生活场所的集中以及他们共同的受剥削的经验为工人有组织斗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 2010-2015 年期间，随着中国初步出现农村剩余劳

动力供应不足的现象，沿海制造业工人的斗争出现了一轮高潮。在工人斗争的打击下，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出现了利润份额和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2015年以后，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方面，资产阶级当局加强了政治上的镇压。另一方面，部分出口制造业向内地省份和劳动力更加廉价的东南亚国家转移。与此同时，中国资本积累的重心开始从制造业转向与所谓“人工智能”相联系的“平台经济”。这些变化，破坏了沿海各省制造业工人斗争的条件，中国的阶级斗争出现了僵局。

以往的资本主义技术革命都带来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但是，目前的所谓“人工智能”技术革命并没有在物质生产领域明显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与之相反，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近年来都是趋于下降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制造业部门仍然一如既往地依赖血汗工厂式剥削，而并没有加快自动化的步伐。甚至在所谓高科技的“顶尖”大型公司，都要高度依赖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提前透支职工身体健康的所谓“996”剥削模式。

所谓“人工智能”到底给资本主义带来了什么好处呢？现在看来，所谓“人工智能”的作用，一方面是暂时加强了资产阶级国家监控和镇压的能力，另一方面，是促进了传统家务劳动的商品化。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广大劳动者的劳动力再生产，一方面是通过购买资本主义部门所生产的作为商品的消费品来完成的，但是除此以外的很大一部分，仍然是通过非资本主义、非商品化的家务劳动来完成的。比如子女的抚养，在家做饭、洗衣，劳动者用自己工作以外的“闲暇”来购物、看病、锻炼身体等。

以上这些活动，都要占用劳动者生命有效时间中很大的一部分。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地促进劳动者家务劳动的商品化，将由此“节约”出来的时间变为可以被资本家直接剥削的时间。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耐用消费电器的普及（比如洗衣机、洗碗机、冰箱等）以及快餐文化的发展都起着替代家务劳动的作用。相应地，是妇女作为新形成的剩余劳动力队伍大批进入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附带说一句，通过鼓励性解放、消解传统家庭、倡导同性恋，或者通过类似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都可以起到减少劳动者在抚养子女方面投入的家务劳动时间的作用。但是由此“节约”出来的劳动力对于资本主

义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这些社会变化在长远会减少资本主义经济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

在中国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属于以出口制造业以及为之服务的各个部门为依托的半外围经济体，几乎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都严重依赖超长劳动时间（每周70小时以上、全年几无节假日）、超高劳动强度的剥削模式，甚至于象牙塔般的大学校园亦不能幸免。因此，家务劳动的商品化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特别重要。

目前看来，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所谓“人工智能”的作用主要是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消费者在网上购买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平台”。这样的“平台”可以减少消费者用于做饭用餐、外出购物、个人交通等方面的时间。但是为了支撑这些“平台”又需要数以千万计的外卖员、快递员、滴滴司机等提供廉价“高效”、将人的体力脑力都用到生理极限的“服务”。

就眼前来说，中国“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处于原子化、碎片化、听任资本家随意剥削的悲惨境地。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平台经济”劳动者目前在阶级斗争所处的被动地位是暂时的。历史经验表明，当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批劳动者新进入一个行业或者新来到一个地区时，他们往往是不敢斗争也不善于斗争的。这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因为劳动者们还不熟悉新的行业、新的地区，还没有建立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进入新行业、新地区的第一批劳动者其直接处境往往比在旧行业、旧地区中有所改善。中国“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目前的处境就与历史上进入新行业、新地区的第一批劳动者的处境类似。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对资本家暂时有利、对劳动者暂时不利的条件都会发生变化。就中国的“平台经济”来说，随着大批劳动者涌入这些行业，劳动者通过从事“平台经济”能够得到的有限的收入优势将会迅速消失。从生活场所和工作场所来说，“平台经济”的劳动者不像制造业工人那样集中。但是，由此造成的对劳动者组织的不利影响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社交媒体的联络作用以及“平台经济”劳动者共同的被剥削被压迫的经验所抵消。随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萎缩以及整个劳动力队伍的老龄化，能够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承受“平台经济”非人剥削的劳动者数量是有限的并且将逐步趋于减少。这样，到一定阶段，从事“平台经济”的劳动者队伍将逐步稳定下来，并且不再有大

量的新生劳动力从其他行业输入。到那时，一直被资本家鄙视和轻蔑的“平台经济”劳动者很可能就会以新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的方式组织起来，并且给资本家以沉重打击。

半外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中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半外围国家。就是说，一方面，中国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队伍；另一方面，中国的资产阶级又无法染指国际产业链中附加价值最高的那些部分，从而不占有垄断性的超额利润。

这个基本矛盾一方面决定了，在中国资本主义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中国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必然要联合和组织起来并且提出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另一方面又决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既不掌握充足的物质资源也没有相应的政治意愿来通过某种形式的经济和社会改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现一定的阶级妥协。因此，只要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不放弃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这些要求就只有在打破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以后才有可能实现。这是现代中国区别于其他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一个基本优点。这个基本的特点和优点，是各（核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具备的，也是所有的外围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具备的，也是俄罗斯、拉美等依靠出口能源和原材料的半外围国家所不具备的。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在世界技术的真正前沿与美欧日等核心国家竞争，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提高表面上的劳动生产率以及维持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主要靠两个方法。一是靠维持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投资率，通过强行提高国民经济的固定资本密度的方法来维持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二是靠在几乎所有的经济部门推行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剥削模式。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劳动时间之长、劳动强度之高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中所罕见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史上也堪称“名列前茅”。由此给劳动者在生理上和精神上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早已经挑战人体的极限。这样的超级剥削模式要维持，还需要另外的条件，从而使得劳动者不至于在精神上陷入完全绝望，从而失去被资本家有效剥削的能力。这个另外的条件，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目前仍然能够提供的较为快速的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平

均每年 5%以上或者说每隔 15 年翻一番)。因为这个条件的存在,劳动者们至少还有理由相信,自己所蒙受的非人剥削,在有生之年还有一定的现实希望可以转化为自己或子女在物质消费水平方面的显著提高(对于来自农村的劳动者来说,就是成为“城里人”并在城市扎根落户的一定的现实希望)。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做支撑,如果中国经济陷入了停滞从而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陷入了停滞,很难想象中国现有的资本主义剥削模式还能够维持而不引起劳动者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大面积崩溃。

但是,实际工资的快速增长、高强度的固定资本积累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逐步逼近却永远无法达到世界技术前沿(从而由技术赶超带来的“红利”急剧萎缩)又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必然不断趋于下降。利润率的下降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当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到世界平均水平以下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很可能面临着大规模资本外逃,资本积累的进程将戛然而止。

一旦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率大幅度跌落,实际工资的快速增长再也无法维持,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以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为特点的剥削模式也将无法维持,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必将颠覆整个的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秩序。

美国霸权衰落的后果

在历史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正常运行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霸权国家来充当整个世界体系“管理者”的角色。这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由许多个“民族国家”组成的,却没有一个“世界政府”。这样,如果没有一个霸权国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无法超越个别的民族国家之上来维持和促进整个体系的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

荷兰、英国分别是十七世纪和十九世纪的霸权国家。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美国一直充当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家。

作为霸权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是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政治稳定和海外贸易的安全。在美国霸权时代,这主要是通过美国的海空军以及美国在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来完成的。

但是,随着美帝国主义的衰落,美国目前正在从东亚收缩防线、从中东和中亚地区撤出,还准备从欧洲撤退。

拜登集团上台后，有可能按照美国大资产阶级的意志，妄想恢复美国对欧亚大陆的统治。具体来说，就是在中东颠覆伊朗及其盟友（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黎巴嫩的真主党民兵武装以及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在欧洲将北约推到俄罗斯边界（不仅将乌克兰纳入北约还要颠覆白俄罗斯），最终目标是要在俄罗斯实现颜色革命。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大战略”。在这个“大战略”上，主张“人权高于主权”的克林顿、奥巴马等民主党政客与主张“新保守主义”的传统共和党建制派是完全一致的，但是遭到了继承美国孤立主义传统的特朗普民粹主义运动的反对。

但是，美帝国主义现在的处境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美帝在伊拉克、阿富汗侵略战争的失败表明，由于美帝国主义既没有相应的经济资源也无法在国内得到足够的政治支持以组织一支几十万人以上的大规模占领军，美帝甚至不能有效地侵略和占领一些经济上十分贫弱、内部又四分五裂的中等规模的外围国家。这样，拜登集团尽管鲸吞中东和东欧的野心不死，最后还是要面对现实，服从于世界范围战略撤退的大趋势。

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来讲，美帝不再能够有效地担任“世界警察”的角色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这是因为，作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出口国，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十分依赖来自海外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长期以来，中国资本主义海外贸易的安全以及能源原材料供应国的政治稳定都是靠着美帝的保护来确保的。随着美帝日渐力不从心，中国资产阶级自己却拿不出像样的海军更没有遍布世界的军事基地来保护中国资本家“持剑经商”。

尽管中国资产阶级以及附庸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把中国资本主义的工业能力吹上了天，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实际上生产不出真正尖端的海空军装备。放眼中国的周边，中国资产阶级连一个可靠的盟国都没有，倒是有不少潜在的敌国。由于没有连成一片的可靠盟国，中国资产阶级就无以建立大量的海外军事基地；没有大量的海外军事基地，即使有先进的海空军装备也无从发挥作用，造多少艘航母都是北洋水师般的摆设。

这样，一旦中东等地区发生重大的革命或毁灭性的战争，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就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在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来临的时候，美国和中国是世界阶级斗争的主战场。两个主战场中，中国战场起着更加决定性的作用。在整个的国际资本主义分工中，中国居于中心的环节。这个中心的环节一旦瓦解，整个的体系就将分崩离析。